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0月15日第24期 总第17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70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三）

【专稿】钱理群 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

一. “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1.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种文革理念、目标，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
2. 清华文革第一阶段：“保蒋与反蒋”（1966年6月1日——9日）
3. 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阶段（1966年6月10日——8月8日）
4. 毛泽东与刘少奇最后摊牌
5. “八八”派与“八九”派之争（8月8日——9月23日）

二. “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1. 从井冈山红卫兵到首都三司
2. 三次重要出击

三. 从文争到武斗：造反派的分化

1. 群众政治主宰校园：一个难得的历史空隙
2. 群众掌权以后面临的考验
3. 造反派红卫兵的分化与分裂
4. 文争到武斗的历史教训

四. 造反派红卫兵运动历史的终结

1. “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的前因后果
2. 最后的接见
3. 历史的最后一页：工宣队统治下的清华

【专稿】

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

——读蒯大富《潮起潮落》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和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¹

钱理群

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学生红卫兵运动与大学生红卫兵运动两部分组成的，它们在文革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大体说来，中学生红卫兵起的是点火的作用；大学红卫兵，主要是造反派红卫兵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1966年10月——12月间，更是起到了主导作用；在1967年一月革命工人造反派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仍然是一只举足轻重的力量，直到1968年8月自己也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们选择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作为讨论的切入口，是因为如一位历史当事人所说，“与中央的政治斗争直接相连互动无疑是清华大学文革引人注目的原因。但是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值得关注：这就是在脱离了党政组织系统足足两年的‘自由放任时期’。清华校园犹如一个政治、文化的‘小生（态环）境’，演绎着一个数以万人计的政治派别的自组织演化过程。这是一个由井冈山（蒯大富派）与414派两派自发组织之间的博弈，从联合到分裂，从文争到武斗的政治历史。在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两重性——被控制性与自发性——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²。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清华文革“这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收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香港中国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出版。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出版。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² 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读孙怒涛对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回忆的一点想法》，收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56页。

一个”典型，来讨论文革时期群众政治与国家、政党高层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群众政治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这也是本文讨论的两个重点。

一. “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¹

1.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种文革理念、目标，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

让我们回到文革初期的历史现场。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毛泽东七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毛泽东在《通知》里，特定加上的一段话，大概是最能反映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矛头指向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权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里显然埋了一个钉子：究竟谁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正是《通知》公布后，全党、全国，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感到困惑不解的。张春桥后来也回忆说：“这一段，我当时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²

胸有成竹的毛泽东，早在文革准备时期，就于1965年11月11日离京南下；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启，他依然留在杭州，以后又到他的家乡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就像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诗词里所说：“正是神州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凭栏静听潇潇

¹ 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收《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页。

² 张春桥1967年5月19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81页，注释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出版。

雨，故国人民有所思”¹：他让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具体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自己从旁静观，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的故伎重演。

那么，刘少奇又是怎样按照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理念和设计，领导与部署运动的呢？

于是，研究者注意到，在1966年5月到8月，刘少奇以中央文件的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10个文件，批准了各地党委批判斗争数百名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宣传、教育系统的干部。其中有周扬、林默涵、夏衍等文化界主要干部，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等教育界领导，还有各省、市负责文化教育宣传的书记，如辽宁的周恒、四川的马识途、上海的杨西光等等。²可以看出，刘少奇是想把文化大革命局限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打击的对象是思想比较开放，有影响的党内大知识分子，也即1957年反右运动所说的“党内右派”，现在就作为“漏网右派”揪出来，有的是当年的“左派”，到了文革，就成了“隐藏很深的右派”。在打击党内右派的同时，刘少奇还特意提醒更要注意群众、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³这完全是按照反右运动的做法来部署文化大革命，而且符合各级党组织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得到坚决的贯彻与执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人称“西南王”的李井泉就公开宣布：“这一次要捉二十万右派”。⁴

¹ 参看逢先知、金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7页，第14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² 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你不知道的故事》，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第275—276页，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出版。

³ 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部署〉》（1966年6月13日），转引自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5—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⁴ 马识途：《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刘少奇显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以维护和强化党的不受限制与监督的绝对领导，集权于党的官僚体制。因此，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都代表党，对任何一级党的官僚提出不满、质疑、反对，都是反党，而反党就是反革命；同时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铁的纪律，从而要求所有的党员和群众，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允许在党的掌控之外的独立思想、独立组织的存在；而始终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仅要无情打击传统的“阶级敌人”即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而且知识分子、资本家也都在扫荡之列，一切党组织、党官僚眼里的党内外异己者，也随时可以以“新生资产阶级”、“新右派”，以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予以严惩。这样一种以“组织、领导、纪律、专政”为核心的官僚政治，是刘式文化大革命的根基所在。

在刘少奇按照自己的理念与方式推行他的文化大革命时，冷眼旁观的毛泽东也不失时机地发出另一种信号：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时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所在学校的党委书记，就打破了“批评领导就是反党”的政治禁锢，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是对前述官僚政治的核心观念提出质疑：“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又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而且有了这样的公开宣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

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¹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所在：要建立一个“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个人集权统治，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为此，他就要区分两个党（又称“两个司令部”）：听命自己的就是“真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党”，不服从自己的，或自己控制不了的，就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这样，他就在制造个人神话的同时，又要消解党的神话，号召党员和群众“大胆怀疑”，就像当时一位红卫兵读了《五一六通知》以后在写给朋友的信里所说的那样，“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²进而提倡“造反有理”，号召群众冲击从基层、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党组织，挑战党的纪律，打乱既定秩序，创建以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为内核的群众政治。为此，又要给予群众以有限度的言论、结社、出版自由，提倡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以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可以看出，不同于刘少奇的“官僚政治”，毛泽东的文革理想、理念与路线，是要实行“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的结合。胡乔木后来说“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人们由此而联想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直接架起了上帝与信徒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削弱了教会神职势力的权威”，毛泽东在文革中就是将“上帝”与“群众运动发动者”集于一身的。³也可以说，他是要扫荡中间阶层（党官僚和知识分子精英），实行顶层的领袖独裁与底层的群众专政的直接结合。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两文革新理念与设计，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的模式和官僚政治的模式。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夸大这样的分歧：因为官僚政治的模式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逐渐成型与完善的，而1957年反右运动正是毛泽东领导的。因此，414派的第二把手孙怒涛在总结两派政治斗争的实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某种程度

¹ 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均收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第119—121页，第132—134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

² 这封信后来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见逢先知、金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13页。

³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武斗”》，第99页。

上，这是“两个毛泽东”之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文革前的毛泽东，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文革初期的毛泽东之争。¹我们这里说的两种政治模式，不过是一党专政的不同形式。在维护一党专政这一根本点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并无分歧，他们影响下的两派的主流，对一党专政（党的绝对领导）本身也并无怀疑。

把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就特别有意思：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把清华大学作为自己的试验地的。

2. 清华文革第一阶段：“保蒋与反蒋”（1966年6月1日——9日）

孙怒涛在他的回忆录里，将清华大学文革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保蒋与反蒋阶段”（1966年6月1日——1966年6月9日）。²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就给清华师生带来极大困惑：北大党委既然出了问题，那么，以蒋南翔为首的清华党委究竟姓“马（马列主义）”，还是姓“修”（修正主义）？在蒋南翔的有意识的培养下，清华本来就有一只很强的党的积极分子队伍，就纷纷起来“保卫清华党委”。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的许多造反派红卫兵的头头最初都属于“保蒋派”。团派领袖蒯大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³蒯大富出身贫农，一直是党的积极分子，依然按照1957年反右运动的思维（也即我们讨论的官僚政治的逻辑）来思考文革问题，是很自然的。孙怒涛也是贫农出身，也几乎本能地保蒋，但他又感到了毛泽东批转的聂元梓大字报的文革逻辑力量：“清华怎么可能不会像北大那样烂掉而独善其身呢？”因而陷入了“感性上的保蒋与理性上的怀疑蒋”的“纠结”中。⁴

诡异的是，首先起来要打倒蒋南翔的，却是高干子弟。据蒯大富回忆，当时清华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23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78页。J

³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34页。

⁴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80页。

有一万一千多学生，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大约一千多人，占10%，其中就有不少高干子弟，即所谓“红二代”。他们在学校很有影响，特别是文革初期，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都以为有中央的背景。¹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位高干子弟就回忆说，6月初的一天，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约她参加一个秘密聚会，“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开会一样”。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激动地宣布：“清华大学党委是修正主义的！蒋南翔是黑帮！我们要重炮猛轰！”接着刘涛代表党中央表示：“党中央感谢你们！党中央要清华的左派组织起来！”²这里说的“党中央”显然是刘少奇主持工作的“党中央”。第二天批判蒋南翔的大字报就贴满校园。6月9日，就从高教部传来令许多保蒋的师生困惑不解的消息：蒋南翔被停职检查了：蒋南翔显然不是按毛泽东的方式，被清华大学群众自下而上的罢官打倒的，而是按照官僚政治的传统作法，自上而下的由上级组织决定，用行政命令免职，群众只起一个响应的作用。而刘少奇也由此介入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

3. 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阶段（1966年6月10日——8月8日）

6月10日，北京新市委按照刘少奇主持工作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派出50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校园。工作组的成员大都是原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儿，一进校就对在前一段运动中被批斗的基层干部有“一种自然的同情”，又“不惯号称斯文的大学生那种有点野蛮的行为”。有的工作队员直言不讳：“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可以这样做。”这些话迅速公布在大字报上，在校园里流传。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与部分激进学生发生了顶牛，校园开始出现了《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³蒯大富是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57—358页。

² 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第22页，2011年自印本。转引自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收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页。

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84页。

一个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敏感的学生，他在写出保蒋的大字报以后，就已经感到自己的态度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的精神不一致，而当时大家都是根据“两报”（以后又加上《红旗》杂志）来琢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精神的。于是就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工作组到校以后，他用社论精神对照，就感到工作组的做法，和自己“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才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际上他已经直觉地感到了，毛泽东的群众政治的文革新思想与工作组坚持、又受到刘少奇支持的官僚政治的逻辑之间的矛盾。于是6月14日他就和同学私下议论：工作组“不像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我们有怀疑”。6月16日和另外一位同学合作写了一篇《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可以看出，蒯大富还是掌握分寸的：他并没有给工作组定性，只是要求群众有提出怀疑、自主判断、选择的权利。但固守官僚政治也即刘式文革逻辑的工作组却不允许，在他们看来，怀疑就是反党。6月19日薄一波来看这张大字报，蒯大富正好也在场。薄一波知道他就是作者，便问他：你是什么派？蒯大富回答说，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薄一波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这当然不是说笑话而已。6月21日，蒯大富又在一个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夺权”问题的明确提出，表明蒯大富对毛泽东的文革新思维的把握（尽管更多的是直觉）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就像蒯大富后来在回忆里所说，“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路”。¹而这样的说法在此之前的清华校园里都没有出现过，在当时（1966年6月）是相当超前的。因此很自然地就被执行刘少奇文革路线的工作组认定为“右派向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收《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35—336页。

党夺权”的一个信号，而且背后很可能有后台，蒯大富就被视为清华文革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位学生在清华东校门门口，看到一辆轿车停在公路边，一位身着中山服、个子高挑的中年女干部，骑上后备箱中搬出来的自行车，从主楼前进入清华校园。¹这是王光美受刘少奇的委派，到清华蹲点，担任工作组顾问。²也许是巧合，王光美选择了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蹲点，约定6月21日下午去蒯大富班开座谈会，临时决定不去，另派了替身，又不加说明，这就引起了本来就十分敏感的蒯大富的怀疑，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质问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或许存在误会，稍加解释就可解决。但本来就在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以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却断定这是右派向党挑战，决定反击。就由工作组任命的校革委主任贺鹏飞出面，要和蒯大富公开辩论：这也是“引蛇出洞”。

这就有了在清华文革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六二四大辩论”。这是工作组代表的党官僚与群众政治的未来领袖人物之间的一场大较量。开始是贺鹏飞、刘涛等红二代和蒯大富及他的战友对辩，很快就败下阵来。在住地通过专线听现场辩论的王光美，听到蒯大富一上来就唸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语录，就发出指示：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工作组就轮番上阵，企图压倒蒯大富。³却不想这些平时习惯于坐在机关里当官做老爷的工作组领导，一见群众（特别是自称“天之骄子”的清华学生）就露了馅：或者“既没有讲理的信心，也没有不讲理的气势”，或者语言“无味”，“讲话不得要领”，很快就在一片嘘声中下了台。工作组副组长、老红军周赤萍中将只得自己闪亮登场。据一位在场的清华学生回忆，那天周将军身穿宽大的绸衣绸裤，脚登黑色皮拖鞋，手摇大芭蕉扇，“他这一副养尊处优的老

¹ 见樊程的邮件。转引自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心路历程》，第2页，注释3。

² 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159页。刘少奇是6月19日作出决定的。王光美到清华应是6月20日或21日。

³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37页。

革命姿态，马上使我联想到，毛关于‘官做大了就要变修’、‘以其昏昏，示其昭昭’之类的论断”。周将军“是有气势的，有一股‘我就不讲理了，你能怎么着’的大兵霸势”，开口便是“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话音落，大礼堂里便响起一片哄笑。蒯大富只问了一句：“你怎么能代表得了毛泽东思想？”台下的学生们齐声叫喊“问得好”，周将军无以为答，灰溜溜下了台，逼得工作组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亲自出马。他倒不作论辩，只说了一句：“蒯大富同学向工作组夺权就是向党夺权”，摆出党的权势，就无话可说了，但也因此丧失了人心，民心。¹一些原来并不看好蒯大富，以为他“小题大做”的中间派学生也都对蒯大富表示同情和好感，这就为怀疑刘式文革的激进派学生的主张在校园里逐渐占据上风，奠定了舆论、思想基础，甚至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事后王光美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只说了一句：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²刘少奇这一逻辑颇为奇怪的指示，意思还是明确的：要对不驯服的蒯大富，以及一切类似的右派学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正是官僚政治的核心与杀手锏。清华工作组就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在“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下，发动了近40天的“反蒯斗争”。蒯大富本人被关了十八天，并在班级、本系、外系、全校轮番批斗。同时整了700多名师生，打了50多名“蒯派分子”，整死了两个人，另有数名受难迫害者自杀未遂，清华园内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这几乎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重演。蒯大富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他自己也作好了作为“右派头子”流放新疆、北大荒的思想准备。³这样，刘少奇就通过夫人又创造了一个“桃园经验”，清华文革也就成为刘式文革的样板，并被推到了文革初期高层政治博弈的前沿。

¹ 胡鹏池：《清华园的一只蝴蝶》，收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72页，第274页。

²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39页。

³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40页。

4. 毛泽东与刘少奇最后摊牌

历史再一次发生戏剧性的转折：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他大概是看准刘少奇主持、领导下的文革，完全背离了自己预定的文革发展方向，又大大激化了工作组和造反的与并不造反的学生之间的矛盾，正是发动群众进行反击，直捣刘少奇司令部的时机。因此，他回到北京，立刻听取各方面汇报，看了北大、清华几所大学的简报。张春桥还特意把刘少奇对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批语¹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²7月19日，毛泽东就作出更严峻的判断：“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³

接着，毛泽东又作出一个重大部署：派周恩来去清华作实地调查。毛泽东显然认定，工作组进驻以后的清华文革是刘少奇的软肋，他正好以此打开缺口。周恩来首先选择的调查对象，就是蒯大富。这当然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他回北京后的第三天，蒯大富就被解除了监禁，7月29日又被毛泽东点名参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所以蒯大富后来说是“毛泽东救了我”。⁴现在，周恩来总理又在7月31日一天之内两次接见，听他讲“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长达6个小时。8月1日、2日、3日，周恩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约清华学生与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研究者推断，周恩来大约到8月3日调查有了初步结果，是在8月3日晚或4日上午向毛泽东汇报的。8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分非常委就突然接到通知，

¹ “六一八”事件是北大校园发生的部分学生、工人乱批乱斗干部和教师的事件，工作组认定是“反革命暴乱”，除了严惩参与者外，还强调运动必须“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打破旧秩序后要建立新秩序”。刘少奇在其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工作组的做法，“是正确，及时的”，各单位发生类似事件，可以参照处理。参看卜建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158—159页。

² 逢先知、金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22页。

³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41页。

⁴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41—342页。

下午三点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还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矛头直指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指明是“路线错误”，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中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蹲点”云云，更是点出了刘少奇对清华运动的介入，“恐怖来自中央”的依据之一，大概就是刘少奇通过王光美在清华发动的“批蒯”运动。在毛泽东的猛烈攻击下，刘少奇开始还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要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还是不依不饶，继续厉声指责：“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我看垮得好，不垮台不得了！”刘少奇终于忍不住，当面顶撞起来：“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这次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公开、正面冲突，标志着毛、刘之争的最后摊牌。¹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局：8月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刘少奇的问题公之于世：“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泽东这里讲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问题，当然不限于清华；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云云，又确实可以视为对清华反蒯运动的一个概括。这说明，清华初期文革既是刘少奇推行其文革路线的样板，自然就成为毛泽东批判刘式文革路线的一个典型。蒯大富在回忆中说，毛泽东这段话，“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

¹ 胡鹏池：《清华园的一只蝴蝶》，《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78——285页。

材料”，这是不无道理的。蒯大富因此说，不仅“毛泽东救了我”，我也“为毛泽东提供‘弹药’”。¹这两句话合起来，是很能说明蒯大富与毛泽东之间的真实关系的：蒯大富需要毛泽东的保护，而毛泽东要推行他的文革路线也要以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作为群众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文革中的群众政治与毛泽东的独裁政治的关系的象征：它们之间确实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但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毛泽东。为了和官僚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可以给群众政治以相当的发展空间，这样的发展也并非没有意义；但一旦他要回归官僚政治，向其妥协，也随时可以扼杀群众政治：清华文革，以致整个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始放终弃的过程。而1966年7、8月的此刻，还处在彼此需要的“蜜月”期。于是又有许多新的故事。

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临走前，扶植了一个由红二代主持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筹备委员会”（简称“临时筹委会”），由它来领导清华文革。

7月30日，王光美突然来到清华第九食堂卖饭打菜，为学生服务，作了一次“政治秀”。据说有人因此感动得直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也默然接受：这大概是刘式文革作争取群众支持的最后努力吧。

8月4日，周恩来率领一大批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高级干部来清华，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指出“工作组的方向都错了”，表明对蒯大富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并承认“上面要负责任”。许多在“反蒯斗争”中受到压抑和迫害的师生，都热泪盈眶，“有一种‘天亮了’、‘翻身了’”的感觉。²

5. “八八”派与“八九”派之争（8月8日——9月23日）

但工作组的反蒯运动遗留下来的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却在继续发酵，并围绕“要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45页，第344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01页，第397——398页，第401页。

不要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问题上，迅速分为两派。

8月8日，坚持批判工作组错误的部分师生串联起来，成立了“八八串联会”，以后又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作为“八八派”的核心，领军人物是唐伟等人。八八派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反蒯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不满意于工作组矛头向下整学生的做法，也受到压抑，现在有了中央的支持，就公开站出来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了，但他们因为受害不深，态度相对理性。八八派后来就成为“414”的主力队伍。

反对批判工作组的另一部分师生，不甘示弱，第二天也组织了一个“尽快打黑帮串联会”，后来简称“八九串联会”。八九派的主要头头是贺鹏飞、刘涛等高干子弟，其主要成员也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反蒯积极分子，他们反对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是其利益所在，而他们力主批黑帮，其实就是要延续工作组的刘式文革路线。工作组撤离前把主导清华运动的权力交给了他们。他们也就以清华的名义，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以与八八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相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反蒯运动的真正受害者所谓“蒯派人物”，连同蒯大富本人，虽然平了反，但依然处境艰难。蒯大富曾经申请加入八八派，却遭到拒绝。因为在许多八八派的人看来，蒯大富虽然不是反革命，不应该整他，他也绝不是“革命左派”。因此，蒯派这一群人，即使有人加入八八派也没有话语权。这就逼得蒯派必须另成立“井冈山红卫兵”，有了后来的“团派”。

这样，在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之前的8月8日——9月23日这一段的清华文革，就成了“八八”派与“八九”派对峙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看作是前一段“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的延续，分歧的焦点，就在如何看待与对待工作组所执行的刘式文革路线。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工作组，即坚持刘式文革路线、刘式官僚政治的保守派力量占据上风。¹

前文提到的414第二把手孙怒涛在他的回忆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当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02——403页。

时属于八八派，也即坚持批判工作组的造反派立场。作为少数派，他“在班上一直忍受着游离于多数派主流派之外的孤单、郁闷和痛苦”。这其实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在成长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精神困境与思想难题：如何寻找精神资源，建立思想信念，以使自己的造反由自发走向自觉？他为此而苦苦思索，最后还是在毛泽东的群众政治理论里，得到了启发。他注意到体现了毛泽东文革新思想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中的一个论断：“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他顿时觉得“这句话就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为我撑腰似的”。经过反复思考，他写出了《少数派赞》（发表时改为《革命少数派赞》）。在这张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大字报里，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真理处于‘萌芽’状态，仅被少数先进分子所掌握时”。这显然是对造反派的现实处境，所作出的一个理论解释。其批判锋芒是指向官僚政治的核心问题的：其要害正是对党组织的神化，以为党已经穷尽了真理，并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少数（绝对、无条件）服从多数”就成为党的铁的纪律，一切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天然地是错误的，是反党即反真理、反人民的。现在，确认“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是要确认群众即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探讨和掌握真理的权利。应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觉悟，由此而建立的是一个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信念。孙怒涛据此提出了三条原则：“当他认为自己的少数观点符合真理时，他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坚持少数意见，坚持真理。那时，即使他‘光荣地孤立’到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总不随波逐流”；“当他发现自己的少数观点是错误时，他同样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向真理低头，修正错误，而绝不能固执己见，或羞羞答答，不敢认错，更不能文过饰非”；“他并不甘心自己的观点永远是少数，他信赖党，信赖毛主席，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他相信通过顽强的搏斗，能发展成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达到让真理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如果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

还必须在新的矛盾中，成为符合真理的新的少数”。¹这里所说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及“少数——多数——少数”的辩证转化，都应该视为文革初期群众政治的重要思想、理论收获，而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谁都看得很清楚，八八派与八九派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对刘少奇及其文革路线的不同评价与态度。8月19日，八八派的唐伟等人，就贴出了《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立即轰动全校。接着就出现了一批矛头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其中就有《炮轰司令部，炮打刘少奇》这样的重型炮弹。还有些大字报涉及李雪峰、薄一波、陈毅等中央领导。这就引起了八九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强烈反弹。他们立即打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旗号，纠集了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十二所院校的中学、大学红卫兵，于8月24日在清华刮起一场“红色恐怖”风暴。他们通过广播，高喊“谁敢说毛主席、党中央半个不字，我们立即打断他的脊梁，焚尸扬灰。当刷千刀，罪该万死！”“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谁敢阻挠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撕毁校园里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强迫大字报作者交出底稿。还喊着“破四旧”的口号，推倒作为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肆意抄家，抓人，把“黑帮干部”（即所谓“党内右派”）和右派教授关到科学馆、二教毒打，强迫他们互相对打，自辱：“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 xxx 感谢毛主席给你饭吃”等等，竭尽残暴、凌辱之能事。²可以说，以红二代为主体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制造的“八二四”红色恐怖，是刘式文革的最后挣扎，回光返照，将其法西斯专政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也因此彻底失去了民意的支持。这些曾在校园里称霸一时的“贵族红卫兵”从此退出了清华文革的历史舞台。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04——406页。

² 参看孙怒涛：《良知的拷问》，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罗征启：《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1966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收《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13——414页，第300——301页。

二. “中央文革的铁拳头”¹

1. 从井冈山红卫兵到首都三司

八八派与八九派恶斗基本结束以后，被晾在一边的蒯大富就走到了清华文革历史舞台前沿。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很看重蒯大富深得毛主席青睐这一政治资本，因而对他频频关照，或许这背后也有毛泽东的指示。据蒯大富回忆，早在7月21日，他刚刚解除监禁，王力和关锋就来清华看望，请他讲讲对工作组的意见。蒯大富是第一次听说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机构，因此态度比较谨慎，并未深谈，或许这才有了后来7月31日周恩来的特意召见。中间冷了一个多月，到9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等人，专门接见蒯大富和朱成昭、韩爱晶等地质学院、航空学院等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并于17日到20日召开“少数派座谈会”，事实上为北京造反派红卫兵的联合作了思想与组织的准备。朱成昭、韩爱晶都鼓励蒯大富成立一个组织。在他们的支持下，蒯大富集合了几十个同患难的“蒯派”战友，于9月23日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地院、北航来了几百人，以壮声势。²

这时，文革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10月2日，《红旗》杂志13期发表了社论，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号召。社论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这是因为尽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将刘少奇排除在最高领导层外，刘少奇的问题也在党内揭开，但从8月到10月，要推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依然阻力重重，这不仅是因为刘少奇所坚守的官僚政治的传统势力在党内依然强大，一时难以撼动，而且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更是代表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的利益，毛泽东

¹ 这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刊物《井冈山》第149期（1968年6月29日）一篇文章提出的口号。转引自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19页。

²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41页，第346页，第347页。

号召群众造反，自然要受到顽强抵制。也就是说，如果不彻底摒弃以官僚政治为基础和依托的刘少奇文革路线，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文革新路线，就不可能顺利推行，而且有因遭遇软抵抗而消解变质的危险。毛泽东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应对办法就是进一步发动群众，用群众政治来对抗官僚政治，用大批判开路，这就是毛泽东在10月初要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的原因所在。孙怒涛在回忆里，谈到他读到《红旗》13期的社论，立即敏感到，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清华主要的红卫兵组织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因其保守立场必然要遭淘汰，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因其思想右倾，软弱无力，内部分裂，无法再深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新成立的井冈山红卫兵，高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才是我校新兴的最坚定的革命力量”。¹他的感觉是对的：毛泽东此时要向刘少奇文革路线发起总攻击，不仅保守派红卫兵要成为打击对象，也不能依靠温和派红卫兵，只有受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最深，反抗也最坚决的激进派红卫兵才是他所需要的“革命先锋”，群众政治的中坚力量，他的文革路线的依靠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蒯大富的政治意义和价值再一次突显出来，他领导的于此时成立的井冈山红卫兵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以后的事情的发展，都是顺理成章的：10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这也是三司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大会，作了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批刘大战由此而开始。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红卫兵宣读“誓词”。在会上由张春桥的引见，蒯大富第一次见到了江青。从此，蒯大富由清华走上全国文革政治舞台。社会上开始称他为“蒯司令”，俨然成为全国红卫兵的领袖，文革群众政治的重要代表。井冈山红卫兵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22页。

也迅速壮大，成为清华文革的主导力量，并逐渐走向全国。¹

2. 三次重要出击

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红卫兵既是因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文革路线的战略需要而产生，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觉的站队：“要永远记住：我们清华井冈山要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我们的命运和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紧紧地联在一起，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联在一起”。²这也决定了井冈山红卫兵在相当一段时间都以相当大的精力参与全国文革运动，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并且大都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相关指示，可以说是“奉旨造反”，这是最能显示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以及群众政治与高层政治的密切关系的。

于是，就有了三次重要出击。

第一次，是张春桥于1966年12月18日单独接见，对如何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斗争刘少奇、邓小平，向蒯大富作了交代。张春桥说：“从全国来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狂，现在还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挥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³蒯大富在回忆中特意谈到，以后王力告诉他，“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他自己也认为，“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当晚，蒯大富就回到清华开会传达，讨论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中央没有明确意见，不宜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帖到大街去。蒯大富等则坚持说，中央文革小组把如此重大任务交给我们，不应辜负如此信任，必须勇往直前。于是，就在12月25日组织了五千人上街，在天安门集合，又兵分五路，到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47—348页。

² 《井冈山》第149期（1968年6月28日）文章。转引自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19页。

³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18页。

天安门、王府井、前门、西单等主要街道游行宣传。不到一个星期，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12月30日，江青亲自来到清华，表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¹

紧接着，1967年1月6日，井冈山红卫兵就演了一场“骗斗王光美”的恶作剧，蒯大富说，这是下面一个“捉鬼队”筹谋的，他并不知情，这是可能的：这正是青年群众政治的特点，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与游戏性。但1967年4月10日再次批斗，却是得到江青、康生点头的，这是因为这时刚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间接地点了刘少奇的名，正需要群众配合。但井冈山红卫兵在批斗时让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却依然是将政治斗争娱乐化的故技。据说这样的恶作剧引起了周恩来的反感，他批评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即不能搞阴谋诡计。²这或许也是能多少反映周恩来和蒯大富这样的激进造反派的态度与关系的：他会忠实执行毛泽东支持造反的指示，但他自己内心恐怕对蒯大富们的不守政治规矩的“乱来”是深感头疼的，他无法像毛泽东那样欣赏越轨行为，他和激进造反派始终是若即若离的。蒯大富晚年回忆中对张春桥和江青都坚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谈到周恩来，则既表示“佩服”，又说他“比较复杂”，这都是不无道理的。³

1967年4月，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又有了一个大动作：他们在首都大专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上，提出要以首都红代会红卫兵记者的名义，去外地调查和收集文革情况。在场的王力立即表示同意。没有材料说明，井冈山红卫兵的动议背后有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但可以肯定，他们的这一动作，是“正中下怀”，完全符合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文革派此时此刻的政治需要：在“一月夺权”以后，又出现了“二月镇反”，许多地方军队大举抓捕造反派，仅四川一省就抓了八万余人，青海还发生了军队直接向群众开枪，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伤的“二二三事件”。而镇压造反派其实矛头是指向中央文革小组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53—354页。

²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49—352页，第358—359页。

³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78—380页。

的，中央文革为此专门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发出了“不要压制造反派红卫兵”的警告。4月6日，又经林彪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由毛泽东批准，发布《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明令“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十条》发布后，全国各大军区、省军区都不同程度遭到造反派的冲击，军队与造反派（及支持他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普遍激化。¹在这样的情势下，就需要再度借助最能领会毛泽东意图的北京激进派红卫兵的力量，到地方传达中央文革派的声音，支持各地造反派。一周内，井冈山兵团总部先后向哈尔滨、长春、沈阳、南京、杭州、重庆、昆明等地派出记者站或调查组，有关头目还去上海、福州、广州、武汉等地活动，多次参加当地形势讨论会、座谈会，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指示、讲话散布给地方群众，并支持与参与当地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同时又把外地的文革情况汇报给中央文革，特别是反映军队支左、军队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情况与问题。这也就引起了各地驻军的不满，也一定程度激化了中央文革派与地方军队的矛盾。²

这样的矛盾的逐渐激化，就导致了武汉驻军包围毛泽东住地，要求揪出王力的“五二〇事件”。在北京召开的欢迎王力等的大会上，蒯大富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耳听到林彪对周围的人一字一句地说道：“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蒯大富还注意到，林彪对大会呼喊的“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都举了手，他理解林彪的意思就是要“抓住七二〇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他又听王力说，陈再道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就更认为林彪是要把军队里“反他的力量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王力还告诉蒯大富：“毛泽东受武汉‘七二〇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以后又听说毛泽东有“武装左派”的指示。这都使蒯大富敏感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似乎有了新的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7月30日，在清华

¹ 参看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第460页，第461页，第463——466页。

²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53——55页。

召开了由团派主持的“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蒯大富发言说：“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让我们把徐向前揪出来，批倒批臭”，“要拿起枪杆子”。团派的机关报《井冈山》也接连发表社论，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革命造反派武装起来”的口号。井冈山红卫兵还迅速行动起来：乘车冲进徐向前家，企图绑架；召开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大会，以造声势等等。团派和414派都向外地派出“联络站”，直接参与当地反军活动，遍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蒯大富回忆说，后来是周恩来接见，提醒“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他才收了手。¹

可悲的是，这回蒯大富等激进造反派自以为领悟了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意图，因而紧紧跟上，连414这样温和派也不甘落后；却不料高层政治本不可测，毛泽东更是多变，转眼间，为了稳定军心的大局，又将王力，连同戚本禹、关锋，一起以“反军乱军”的罪名，抛了出来，还由周恩来传出“最高指示”：“去年出去（鼓动造反）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了倒忙”。尽管“帮了倒忙”还不算大罪，但正如另一位414头头唐伟在他的回忆里所说，却是“老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²如果一再“帮倒忙”，是迟早要被抛弃的。

三. 从文争到武斗：造反派的分化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清华校园内部。事实上，随着文革的发展，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参加社会上的运动的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必然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学校自身的运动，同样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1. 群众政治主宰校园：一个难得的历史空隙

在许多清华人，特别是清华造反派红卫兵的记忆里，从刘少奇工作组撤离，到工宣队进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77—378页。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56—62页。

² 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收《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10页。

校，也即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在清华大学历史上，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最为独特的时期”。由于停课，校、系各级的行政、教务管理几乎全部停顿；由于对党委的否定和冲击，校、系、班级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不再发挥领导作用。整个学校工作的运行，运动的推动，“改由群众自己组织的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这样的以群众政治取代官僚政治，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历史空隙，不仅空前，而且绝后。人们这样描述学校的新秩序：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许诺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两项群众政治的基本条件和原则都得到认真实行，“那时候，民众自由结社，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们跨系跨年级，组织战斗组，自行选举群众组织负责人。言论自由，也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召集会议，人人可以上台辩论。出版呢，群众可以编写和印刷小册子，群众组织自己办报纸，也是可以的。比如当时清华《井冈山报》的发行量可能比许多官方报纸都大得多”。¹

这样的有限、短暂的思想、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对这一代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思想解放。如他们自己所说，“文革之前，我们都是在大一统的价值观念下生活，年轻人的思想被禁锢在设定的框架之中，自由思考被视为一种不能容忍的异端追求”，²“在文革之前，经过反右、‘三面红旗’、学‘九评’、参加‘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洗礼’，在我们脑海中已经深刻地印下了‘反党就是反革命’、‘反党分子人人得诛之’这样的烙印，什么是反党？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有异议的，对党不满有牢骚的，甚至对某个党组织有不同意见的，与党的某个基层领导有争执的，都有可能上纲成对党的攻击，都有可能被视为反党”。现在却可以“怀疑一切”了，尽管还有一个限制：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怀疑”，但至少可以对党的各级领导表示“不满”，对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异议”，那些“设定的框架”、“大一统的价值观念”等等，也都因此而开始动摇了。³如另一个清华人所说的那样，

¹ 陆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收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14页。

² 王允芳：《磊落的一生》，收《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1页。

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97页，第698页。

“我还会像过去那样对校党委和工作组那样积极靠拢，坦诚交心了吗？显然不会了”，“两年多的自由生活，强烈淡化了我的组织意识，解除了纪律对自己的约束”。¹前文谈到文革是毛泽东式的“宗教改革”，在这一代清华人的感受里，“这有点像欧洲宗教改革后对圣经的解释不由牧师垄断一样，信仰者已经有了一点解释它的机会与权利了。这毕竟是一个解放我们心灵的变化”。²尽管“圣经”的控制依然存在，但至少有了自己的解释权，文革中也确实出现了不同于官方解释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独特理解，思想垄断也就开始打破，这毕竟也是一种解放吧。

许多人还谈到了作为群众政治的另一个核心内容“自己管理自己”的积极意义：它是对群众社会自治能力的有力有效训练。群众政治中所形成的不同派别，尽管出现了我们将在下文详加讨论的弊端，但毕竟“容纳了同学们参与政治的热情要求，反映了各自的不满与诉求，它焕发出来的蕴藏在人们身上的责任感、创造性、效率与学习能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³甚至有人认为“可以将它们看成是两党政治的雏形”。⁴这也是一所大学，政治与社会大学。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大学生，许多人都有较强的政治意识，行动能力，组织、自治能力，文革中两大派别中的许多骨干后来都成为改革开放与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是与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政治与社会自治的训练不无关系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学习”问题。文革中的群众中政治，并不只是打打杀杀，或者说，经过了最初的打打杀杀之后，总有一些人，从政治狂热中冷静下来，开始面对文革中遇到和提出的种种问题，也包括自身的思想困惑，就有了重新思考与学习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股“自由读书”的浪潮就在校园里暗暗涌动，这是这些年人们十分关注的文革后期“民间思想村落”的读禁书的发端。这不仅是因为读书、学习是青年学生的本性，清华大学的这些佼佼学子更是如此；而且校园里放任不管、相对自由的环境，

¹ 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77页。

² 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58页。

³ 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59页。

⁴ 陆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27页。

也最适于自由读书。正规的教授主导的大学停课了，以学生为主的“自修大学”反而有了发展的机会。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回忆：一群414派的大学生聚集起来，大约二十余人，也参加运动，作了一些解放干部的工作，革命之余，就一起到处找书读：“与书友们畅所欲言地交换心得，坦诚无虑地发表看法，理性平静地进行讨论”，“如此集中、大量、专注而又自由的阅读，以及伴随其中的脑力激荡，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过去没有，后来也很少有。这是一个心灵洗练、精神醒悟的过程，对我思想启蒙的影响，深刻而又久远”。回忆中还留下了一份书单和当时的读书笔记，这就为我们认识特殊年代的那一代大学生读书生活、精神追求与状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里要介绍的是他们最热衷读的九本书。梅林的《马克思传》——“我懂得了要成为一个革命者，首先需要正直、忠诚，不能伪善、堕落；为了追求真理，必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能像奶酪里的蛆虫一般，逃避现实的斗争”；伏契克的《牛虻》——“他渴望冒险，视死如归”，“钢铁般的坚忍力量，火一般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病态的拼命主义精神，紧紧攫住读者的心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主人公）拉赫美特夫近于自虐性的苦行僧式锻炼，在钉满了几百个钉子的床上睡觉”，以及他作为革命者“在感情和性爱关系上的特殊态度”，都引发热烈的讨论，“我们平日的话题，都围绕着这本奇书”。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第一次得知斯大林时代在“1936——1938年大清洗时期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作者又告诉我们：“人类一切进步都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这种血腥的代价是不是值得？我深感困惑”。托洛斯基《斯大林评传》——突然接触到党的高层领导内，“居然会有如此激烈、如此残酷而又齷齪的内斗”，我“手脚冰冷，毛骨悚然”；书中提到“领袖与国家体制的关系问题”，更是“发人深省”。苏联学者凯尔任策夫的《巴黎公社史》——第一次对巴黎公社的原则有了历史的具体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人掌握了政府的职能”；同时开始追问“巴黎公社为什么失败？”而对“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公社的精神永存不朽”印象尤其深刻。最后必然将文革与巴黎公社“相互类比”：“难道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正是要把中国带到一百年前巴黎公社那样的

政治结构去吗？我对此感到茫然不解”。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引发的思考是：“纳粹为何能够兴起？造成纳粹上台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作者特意谈到，纳粹的成功在于“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宣传的艺术”，“他们知道‘精神上与肉体上恐怖’的意义”，这都引发了内心的震动。印象最深的最后两本是狄更斯的《双城记》和雨果的《九三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革命的同情与对暴力的憎恶相互纠缠在一起”，这是最能打动与启发这些文革中的大学生的，而两位作者的基本立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也许还不能让处于文革高潮中的年轻人立刻接受，但怀疑也在悄悄发生。从以上简单介绍里，可以看出，文革特殊条件下的校园“自修大学”里的自由读书，对这一代大学生的思想影响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继续培育和强化了他们的做马克思那样的革命者的志向，和牛虻式、拉赫美特夫式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与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从巴黎公社试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纳粹德国的历史对照里，面对文革的中国现实和问题，就有了全新的思考。其中所提出的“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他们以后进一步的反思，更是播下了重要的种子。当然，这样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重要的是，怀疑已经产生，思考已经开始。当事人把他们校园里的自由读书、思考与讨论，称之为“自我启蒙”，是有充分理由的。¹

所有这一切：在摆脱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掌控，群众政治主宰的校园里，出现的言论、结社、出版自由，思想的解放，参与政治、独立自主的意识与能力的训练，以及自我启蒙，无论如何，都应该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像孙怒涛在他的反思里所说，“我不认为那点解放有多深远的意义，那仅仅是禁锢的思想牢笼里的一丝微光。我不认为两派互相制约监督有多大的实际作用，那仅仅是没有法制的用于两派恶战的派性手段。我不认为那点民主权利就是我所追求的法治下的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在文革历史上这一点

微小的积极意义也是应当肯定的。针对当今的中国，是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的。而历史的

¹ 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89—105页。

进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积累的”。

我们这里所面对的正是历史的复杂性：历史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是相互纠缠的；而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的局限性，或许是更带根本性的。因此，我们在肯定了文革群众政治的积极意义以后，就要更集中地讨论其历史的局限，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在作更全面的展开之前，先作两点讨论。首先，就像前文已经说到的那样，文革中的群众政治是与独裁政治共存为一体的，它们共同对抗官僚政治，而主导者始终是独裁政治。也就是说，文革群众政治本身就是适应毛泽东的独裁政治的需要，并由其扶植的产物，是一种受控制的，因而具有先天性的依附性政治：成为其存在前提的言论结社自由，既是毛泽东所赐予，也是毛泽东可以随时收回的。它的造反，就每一个个体而言，固然都有自身内在的原因与逻辑，但作为一个群体，却基本上属于“奉旨造反”。其造反的精神资源也基本来源于毛泽东思想和指示。像前文讨论的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以充当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文革派的“铁拳头”为使命与追求，自觉为贯彻、保卫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而战，都是由其本性决定的选择。这都说明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是具有历史的脆弱性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革群众政治的理论基础，基本信念与行为方式是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文革群众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合理性、积极意义是在它反对官僚特权，但将其推向反对任何权威，精英，集中，强制，管理以及相应的管理阶层的存在的必要的极端，就成了“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的“反权威”其实是要维护自身（群众）的权威，是很容易导致群众专政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内在的专制性。因此，无政府主义又是反法制的，是一种“无法无天”的“大民主”。蒯大富后来在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时说：“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¹这是一语道破了无政府主义的实质与危害的。

无政府主义之外，还有民粹主义，其集中表现就是所谓“群众崇拜”。它是与文革中达

¹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85页。

于顶峰的“个人崇拜”相互补充的，都是文革群众政治与独裁政治的产物，构成了文革意识形态的重要潮流。群众崇拜的公开鼓吹者是林彪。他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的是合理的”，¹这就把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政治观推向极端，“将群众意志神圣化，普遍化，以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为绝对价值”，“将群众的无拘束、无控制、非理性的‘自由’当作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所谓“群众自己相信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变成了“群众的自我崇拜”，“人民当家作主”变成无政府主义的随心所欲。²这样的群众拜物教，最终也必然导致群众暴力与专政。正是这样的内在暴力性与专制性，就决定了以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为内核的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即所谓“大民主”政治，尽管也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意义，但却不能发展为现代公民政治，现代民主政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局限。

2. 群众掌权以后面临的考验

群众政治主宰校园也分几个阶段。从1966年8月到12月，是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和八八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又分“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三大群众组织并存的阶段。1966年12月21日，三大组织经协商，成立了“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因其在反对工作组时所表现出的执着、坚韧和机敏、口才，以及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支持，而获得清华造反派的信任，被推选为第一把手。这样，这位“蒯司令”就成了有着悠久历史与国内外巨大影响的清华大学的掌权者。这在清华历史上也同样空前绝后。人们自然关心：他如何掌权？怎样治理学校？很快就有了对他的不满和批评：担任兵团第三把手的前文提到的唐伟就认为蒯大富“志得意满，任人唯亲，唯我独左，怀疑一切，自我膨胀”，并想起周恩来曾经的警告：“当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受压的时候，我们不担心你们会犯错误。现在你们开始掌权了，到了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在蒯大富拒绝接受自己的意见的情况下，就自动辞职，离开了总部，并于1967年1月在兵团下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

¹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²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第289页，台北洪叶文化有限公司，2000年出版。

天安门纵队等所谓“纵队派”也即内部反对派。¹蒯大富为首的总部及其支持者也立即反击，认为“唐伟等人反总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代言人”，并提出：在清华“对待兵团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蒯大富也发表声明，认为“托派分子（即托洛斯基派，斯大林的反对派，文革时被视为“修正主义者的鼻祖”）在趁机夺权”。这样就引发了兵团总部与纵队派的更加激烈的争辩，一直延续到1967年4月的最后分裂。²而蒯大富也因为不容不同意见而备受批评，被认为是“造反有力，治校无方”，以后就有了“打天下者不能治天下”之说，下面我们会有详尽讨论。后来毛泽东也批评蒯大富，说他自我“膨胀”，“全身浮肿，害浮肿病”，做事“很蠢”。³这一点，蒯大富是认账的，他在回忆录里就坦然承认：“那时，整个清华就在我手下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第一次见到许世友司令员，他就说：“蒯司令，我是你们的士兵啊——”，连邓大姐见面也说：“我是你们的市民——”（按，蒯大富当时还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⁴

这里说的都是实话，实情。但如果把问题都归结为蒯大富个人修养，经不起考验，就过于简单化与表面化了；其内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正是我们要讨论的。

有研究者指出，文革时期群众政治里的群众组织是有“准政党取向”和“准政权取向”的。1968年初开始“整党建党”，团派的某一战斗小组还贴出“清华一切党权归团派”的大标语。据说团派还下令清华党员到团派总部登记。这自然是懂中国政治的幼稚之举，但也说明，一部分群众政治的铁杆骨干，是有取而代之的倾向，至少把自己所在组织看作是学校最高政治代表和权力代行机构的。⁵但文革中兴起的群众政治自身是既无传统又无政治资源的，造反派群众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只能从共产党那里寻找组织与思想资源，并

¹ 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06—307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39页，第679页。

³ 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86年7月28日）。

⁴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63页。

⁵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71—174页。

且仿而效之。这正是文革群众政治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们反对党的官僚政治，试图取而代之；但正像研究者所说，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且富有大一统控制经验、控制制度和控制组织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它“过于早熟，过于强大，过于先进”，因而具有极强的同化力，¹即使是反对者，甚至试图取而代之者也难免被同化，而这是文革群众政治的命运。

蒯大富的问题正在于此：他反对官僚政治，但自己掌权时，无论是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依然是官僚政治那一套。前文提到的所谓“对井冈山团部的态度是真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其内含的逻辑就是“谁反对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团部，谁就是反革命”，这不过是“反对党的某位领导，就是反党”的官僚政治逻辑的翻版。引起反感的，还有蒯大富下令编辑出版《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印了50万册，同学们都戏称为《蒯选》，²这样露骨地宣传个人，显然是文革时期的独裁政治的“活学活用”。孙怒涛在回忆中提到，他开始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蒯大富一掌了权，就要反唐（伟）、反‘八八’（派）”，后来他“知道了斯大林一上台也是把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一个个搞掉的。毛泽东一建国也是把高岗、彭德怀、刘少奇一个个搞掉的”，这样一想，“蒯大富这样做就毫不奇怪了”：他只是按照“手握大权以后，就要消除异己，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的党的官僚政治的“惯例”行事而已：“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³问题正是在于，体制、理论、路线都没有变，就必然要“做同样的事”：这是一种被官僚政治同化了的群众政治。

最能表现这样的“同化”的，是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术》。我们还看到一个农民造反派当上县委书记掌权以后总结出的“权经”，正好一并讨论，这是很能看出文革中的群众政治的特点，及与党的官僚政治、独裁政治的关系的。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权经、权术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权力崇拜”，“唯权力取向”：“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有人笑我们满脑子是权权权，是

¹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53页，第5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

² 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06页。

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42页。

一个念念不忘夺权的‘野心家’。在政权问题上，我们就是毫不含糊，当仁不让！我们宁可做‘野心家’，也不愿意当糊涂虫，马大哈”，“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¹“要敢于用权。你敢于用权，人家才服权。你不敢于用权，人家当然不服权”。²这样的权力崇拜基于毛泽东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思想，直接源于林彪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出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的论断，³这句话不仅高度概括了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与经验，也成为文革的独裁政治和群众政治的出发点，归宿和基本内容。一切围绕“权”而展开，“‘权’仿佛成为贯穿文革机体的‘神经’。有无权力，权力大小等等成为文革政治生活，也是文革群众组织的永恒主题”。⁴其二，权力的暴力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的时间给以毁灭性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到将来”，“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⁵“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抓就抓，想放就放。我们想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⁶这其实就是林彪所说“政权是镇压之权”的意思，⁷这也是党的政治（官僚政治和独裁政治）的核心，在文革中更有广泛影响。其三，巩固权力的要素：“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巩固政权的两大要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⁸“要学会制造舆论”。⁹建立政治威信的关键又是集权，即所谓“当干部要当秦始皇，要高度集权”。¹⁰这里所说“政治权威——组织控制——舆论操纵”三要素，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政党、国家政治。现在，也渗透到了文革群众政治中。其四，超越道德底线的权力

¹ 蒯大富：《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1967年），收《权术三十六条》（1968年），《边缘记录：〈天涯〉民间语文精品》，第400—401页，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孙怒涛认为《权术三十六条》“不一定是蒯大富自己成文的”，但他确实讲过不少与权经相类似的言论，见《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上的心路历程》，第465页。

² 某农民造反派出身的县委书记的权经，转引自卢跃刚：《大国寡民》，第291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出版。

³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⁴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74页。

⁵ 蒯大富：《权术三十六条》，《边缘记录：〈天涯〉民间语文精选》，第400—401页。

⁶ 蒯大富的一次讲话，转引自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上的心路历程》，第578页。

⁷ 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⁸ 蒯大富：《权术三十六条》，《边缘记录：〈天涯〉民间语文精选》，第400—401页。

⁹ 某农民造反派出身的县委书记的权经，转引自卢跃刚：《大国寡民》，第291页。

¹⁰ 某农民造反派出身的县委书记的权经，转引自卢跃刚：《大国寡民》，第291页。

操作：“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¹“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只要目的是革命的，可以用一切手段”。²只讲政治谋略，不讲人性、良心，就必然随意越过道德底线，“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正是文革中盛行，祸害无穷的政治伦理。关于政治谋略与权术，蒯大富还有一番高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地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利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我对此有过这样一番分析：“这是把毛泽东的权势权术真正琢磨透了：从‘革命高潮’时发动大跃进；到‘遭到突然事变’（大饥荒）时的‘迅速调查’、‘积蓄力量’、‘利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最后，又‘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其中的精髓、要义，现在被红卫兵造反派的领袖领悟到了”。³这些文革中的群众领袖在掌权以后可以说是把党的政治（官僚政治与独裁政治）的观念、思维、伦理、组织、手段，权势与权术，全部接受，自觉继承，他们自己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如此全面、彻底的同化（党化），确实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

3. 造反派红卫兵的分化与分裂

这也就必然引发不满，反思，抗争，分化，以致分裂。在经历了井冈山兵团内部的两派：兵团总部与下属纵队派的将近四个月的激辩以后，到1967年4月4日成立“414串联会”，再到5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正式宣告成立，就公开分裂成

¹ 蒯大富：《权术三十六条》，《边缘记录：<天涯>民间语文精选》，第400—401页。

² 蒯大富的私下言论，转引自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65页。

³ 钱理群：《文化大革命时代》（上），《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下），第08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出版。

两个造反派组织，分别简称为“团派”与“414派”。两个总部独立存在，各行其政，围绕“该由谁掌权”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文攻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清华文革，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¹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大学在1967年春出现团派与414派的政治分歧与组织分裂，形成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与“温和派”两大派别，并非孤立，而是一个全国性现象。当时，就有“全国性的‘团派’和‘四派’”之说。据说同属“团派”（即激进派）的有：河南“二七公社”、长沙“湘江风雷”、哈尔滨“炮轰派”、成都“八二六”、重庆“反到底”、武汉“工造总”及“三钢”等；同属“四派”（温和派）的则有：河南“河造总”、长沙啊“高司”、哈尔滨“山上派”、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等。²这样的分析，自然是有道理的；但由于对各地的运动没有具体研究，下面的讨论就仍集中在对清华运动的讨论，以上说法只能作一个大背景。

对于造反派的分化，414的产生，历史当事人有这样的解释和分析：“414的出现，是当时大多数人内心希望减缓文革极端态势的自发而有组织的表现”。³对文革的“极端态势”的不满与抵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掌权的红卫兵即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的“变质”，特别是搞小圈子、压制不同意见的专制倾向，另一面则是反映了“人心向善，民心思安”的诉求，人们对无止境的批判斗争，特别是文革暴力已经厌烦，希望“文革早点结束，社会早点安定，生产生活秩序早点恢复”。⁴因此，当《414思潮必胜》的作者在一次谈话里提出“休整，巩固，妥协”的方针和“解放大多数”的政策，提醒陷于狂热中的文革造反者：“事情的过程必须是波浪形的，有高潮，有低潮，有峰有谷，不能老向前进”，“突变和冲击很必要，但不能老突变，老冲击”，正是符合文革中后期的人心民意的。⁵

¹ 孙洪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53页，第485页，第679—680页，第487页。

² 《和周泉纓谈话纪要》，收《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81页，第384页。

³ 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57页。

⁴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94页。

⁵ 《和周泉纓谈话纪要》，收宋永毅、孙大进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82页，第381页，第384页，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出版。

414也因此吸引了许多中间派的群众。但当它举起“反对派”的旗帜，就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些不仅反感激进造反派，连文革本身也持保留态度的保守派，也加入了414的队伍，或者向他们靠拢。这样的队伍内部组成的变化，也会不同程度影响414派的政治观点、立场和态度。

而414和团派发生分裂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观念、立场的分歧。这又集中在干部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与主张。

干部问题成为夺权以后两派斗争焦点，绝非偶然。夺权之前，主要是作“破”的工作，任务是造反；夺权之后，就要“立”，要恢复秩序，进行建设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公共管理功能的恢复，这就不能回避官僚政治的合理性方面。如研究者所说，“对于旧国家机器中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部分和因素”，“是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言‘打碎’的，而只能予以继承和改造”，“人类永远不可能釜底抽薪地消灭官僚主义，而只能不断地克服，抑制和减少官僚主义”。¹造反派在清华掌了权，同样面临着维持学校行政、教学管理，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的问题和任务。解决前一阶段被一律打倒、靠边站的干部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当务之急。

而干部问题，在清华又显得特别突出，有一种特殊意义，这是和蒋南翔对清华大学的治理直接相关的。在清华老学生的回忆里，“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蒋南翔深谙党内斗争的真谛，从52年院系调整入主清华，改‘教授治校’为‘党管学校’，借助反右等政治运动排除异己，培养嫡系，组建自己的‘清华牌’干部队伍。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地打造了清华的‘不漏气的发动机’”。这只“清华牌”的蒋式干部队伍特点有二。其一是“听话，出活”，是“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这是“最具清华特色”的，其培养出的学生也是如此。²其二，是“双肩挑”，即兼任业务（教学、科研）和政治工作的骨干。同时，又精心打造一只“政治辅导员”队伍。当年老学生分析说，政治辅导员制度的作用有二，一是“利用各种形式、

¹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72页，第34页。

² 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25页。

各种机会对同学进行‘兴无灭资’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监督、控制，清除异己思想，排查异己分子”，二是通过对政治辅导员的培养、考察，“源源不断输送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维护体制的骨干力量”。¹蒋南翔的做法是成功有效的，如研究者所说，“这支干部队伍的凝聚程度、管理才能和工作效率之高，甚至观念意识和话语体系之同在各个大学中也是非常罕见的”。这都直接影响了清华干部，主要是中、下层干部在文革中的表现与作用。文革初期，清华干部没有发生整体上的分裂和内讧，大都持支持蒋南翔为首的党委的相对保守的态度，少有起来造反，而且整个干部群体都成为批斗对象，至少是处于靠边站的地位。在工作组撤离以后，中下层干部就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学生逐渐分裂为两大派，干部纷纷选队，有的还有深度的介入。据统计，414派中干部和党员的比例为66.6%，团派为27.3%。也就是说，500多名清华中、下层干部大多数都选择了414派，414总部下还专设有20多名干部组成的干部参谋组，他们不仅以自己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管理经验，为革命小将出谋划策，起到智囊库的作用，而且以自己的政治观点，深刻地影响了414派。即使只有少数干部支持的团派，加入其中的干部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者谈到，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在写信给江青的信里，曾预言北大、清华的官僚体系尽管“盘根错节”，但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冲击下，也将“顷刻瓦解”。但文革以后发展的现实，却证明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家体制内的官僚政治的政治影响与能量显然估计不足。蒋南翔苦心经营的清华大学干部队伍就没有“顷刻瓦解”，而是在“经过文革的初步‘洗礼’后‘死而复生’，并加以重新整合”，渗透到群众组织内部，“他们所发挥的政治功能以及所释放出的政治能量”，在清华文革运动史上打下了深深印记。²我们在前文谈到官僚政治对群众组织中的掌权派（激进造反派）的同化；现在，又看到了官僚政治对在野的群众组织（温和造反派）的渗透。一个“同化”，一个“渗透”，是充分显示了文革中官僚政治与群众政治关系的复杂性与微妙之处的。

¹ 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25页，第326页。

²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43—44页，第148—149页。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清华两大派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研究者对此作了一个概括。作为激进造反派的团派认为，清华大学大多数干部“绝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而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蒋南翔十七年来，在清华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广大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这一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清华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是复辟旧清华的社会基础”；犯错误的干部，“要和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的错误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要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监督，交代，揭发，“要在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之后，才能解放”；清华大多数干部都不能进入领导班子，应降职使用或当老百姓，“要敢于提拔年轻有为的小将和地位低的支持造反派的左派干部到领导岗位”。而作为温和造反派的414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清华的广大干部“执行的基本上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大胆解放“犯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干部，“勇敢的保，热情的帮，大胆的用”；“没有大批革命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红卫兵小将夺的权就有可能丧失”，“革命小将要勇于让权，放权”，让“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在各级领导中发挥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¹

不难看出，在干部问题的不同认识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分歧。于是，就有了“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的更具有实质性的争论。在这方面，414派有一个系统的理论论述，这就是《四一四思潮必胜》里提出的“红线为主”论与“阶级关系不变”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在文化革命中阶级关系虽然有变化，但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

¹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02—208页。

七年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¹这就打出了一个“全面恢复十七年体制”的旗帜，也就事实上取消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团派则认为，十七年实行的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依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不仅“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内走资派的支持下，成了资产阶级统治清华的‘参谋部’”，而且“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清华新的特权阶层，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清华的骨干力量”。因此，必须“彻底砸烂旧清华”，实行“大翻个儿”式的“重建”，²显然是要维护文革的激进路线。

因此，最根本的分歧，还在文化大革命观的不同，即对文革有不同的理解与期待。《四一四思潮必胜》特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³其重心显然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大前提；这就是414派的一个头头汲鹏所说的，“两派坚持的理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414在继续革命中更加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老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加强调继续革命”。⁴其实，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仰赖官僚政治体系，而“继续革命”又要打碎官僚政治体系。⁵我们在本文一开始曾讨论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不同文革理解、设计与路线：刘少奇的着眼点就在“无产阶级专政”，要通过文革强化官僚政治；毛泽东则重在“继续革命”，要用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的结合来取代官僚政治。现在我们又发现，清华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与温和派之争，不过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种文革观念和路线在群众政治中的延伸和体现。

由此出发，又有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对象上的分歧。对团派来说，这是明确而不可动摇的，就是要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414派的态度就有些暧昧。在《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里，一方面表示“四一四派和团派在解决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一方面又婉转提出不可忽视“次要敌人”，进而强调，

¹ 周泉纁：《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收《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92——393页。

²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97页，第199页。

³ 周泉纁：《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92页。

⁴ 转引自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15页。

⁵ 参看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60页。

“我们的次要敌人，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文革中“顽强地活动起来，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拼命地在造反派内部寻找他们的代言人”“利用团派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家的狂热性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去打击414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篡夺政权，为全面复辟作好准备”，这实际上就是按照十七年搞政治运动的逻辑，把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把不同于己的个人与派别视为阶级敌人的“代言人”同样予以无情打击，“在对付他们（按，“阶级敌人及其代言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革命的魄力和铁的手腕”，¹这就更是彻底的专政思维和手段了。这样，四一四思潮的内在逻辑就自然通向了十七年的官僚政治。正是在这里显示了我们前文讨论的十七年官僚体系里的干部对414派的深刻影响。原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414重点保护的干部罗征启也参与了《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写作，²恐怕不是偶然的。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谁来掌权”。《四一四思潮必胜》对此也是直言不讳的：“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掌握政权，巩固政权”，“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在《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看来，作为激进造反派的团派，只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交给它的冲锋陷阵的任务”，“成为政权的稳定基础，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理由也很简单：“大多数的工农兵的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里，“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³毛泽东将这样的掌权论概括为“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⁴并非没有道理。这样的凭借出身“天生掌权论”，其实就是老红卫兵的“高干子弟要掌权”论的重演，实际也是要恢复十七

¹ 周泉纁：《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94页，第398页，第399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54页。

³ 周泉纁：《四一四思潮必胜》，《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99页，第395页，第406页，第359页。

⁴ 《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1968年7月28日）（记录稿）

年的阶级路线，维护十七年体系的等级结构与秩序。

从两派分歧的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414派基本上是一个“十七年派”，即主张回归十七年的官僚政治，以此批判和否定文革中推行的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激进路线，后者恰恰是团派所要竭力维护的。研究者因此概括说：“团派思潮更多的是一种文革‘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群众性思潮”，414思潮则是“以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和正统秩序来批评、怀疑并进而有可能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潮”。¹这里说“有可能否定文革”是注意了分寸的：尽管414思潮的客观逻辑是指向否定文革的，但就414的头头、骨干、群众的大多数而言，就像414二把手孙怒涛在他的回忆里所说的那样，他们“抵制批判极左思潮，并没有认识到左倾路线是左倾思潮的根源，并没有否定文革，并没有对毛泽东以及政治体制有过一点非议”，他们是用十七年的官僚政治来批判文革，用孙怒涛的另一个说法，414是用“文革前的毛泽东”来批判“文革中的毛泽东”，而团派则要捍卫文革中的毛泽东。²

作出这样的不同选择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这就不能谈到，也是不可回避的“利益”问题。孙怒涛说得很好：“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两派群众）确实都有很高昂的革命热情，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以及相当纯洁的革命动机，同时也有革命外衣包裹下的强烈的政治利益诉求”。³于是，就注意到这样两组统计数据。学生干部党员在414中占62.6%，在团派中只占27.4%；教职工中的党员，亮相到414的占47.1%，支持团派的占30.5%：这表明文革前在政治上占据优势，作为依靠对象的学生干部党员和清华干部队伍中的多数，都聚合在414里。而因文革前受压不满清华旧党委的“反蒋分子”在团派中占60.3%，414占33%；因受工作组压制而“反工作组分子”65.6%加入了团派，加入414的仅占29.3%：这表明在文革前与文革初受压制的学生大都成为团派的骨干。而文革前与文革初都备受重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死保工作组而被视为“保守派”的“八九分子”，68%都参

¹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30页，第234页，第513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92页。

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28页。

加414，参加团派的仅占20%。¹孙怒涛据此而得出结论：414是以文革前因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占优势的学生为主体，“基本上代表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都拥戴‘红线主导’论”；而团派则代表了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的问题，而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受歧视者”的利益，“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彻底砸烂’论”。政治观点和诉求的不同背后，确实有各自的政治利益。两派强烈的掌权欲望，也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利益：414是“文革前的既得利益者，文革让他们利益受损。他们拼了命也要阻止团派一派掌权。他们确实有回复（难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复辟’）到文革前美好日子的强烈愿望”；而团派则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拼死也要保卫文革给他们带来的胜利果实”。²

这就是鲁迅说的：“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³

当然，这样的分析只具有相对意义，会有例外，像孙怒涛，他虽出身贫农，但因为在文革前的“学习九评运动”中的“言论不正确”而成为“不可信任者”，备受压抑，但他更注重独立思考，对团派的观念、做法多有不同意见，最后走出团派，还成了414的头头。具体到个人加入哪个派别，就更有许多复杂的，甚至偶然的因素，是不能简单地完全归之于利益的。⁴

而且还应该指出，414派就其总体而言，属于温和造反派，而其内部，也还有不同的倾向。我们一再引述的《四一四必胜》一文，414内部就有不同的意见。据孙怒涛回忆，许多“中间群众以及总部委员中的教师，干部，这些都是温和的老四，他们认为周泉纓的观点太右了，414不能越右越好，越走越右”。孙怒涛自己也认为，《四一四必胜》的基本观点，如“红线主导”论及其“部分改善无产阶级政权”的观点，都代表了“414群众”的共识，但又“确实有种右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414内部激进分子的极端行为会葬送

¹ 见沈如槐（414第一把手）：《清华文革纪事》。转引自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18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19页，第530页。

³ 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⁴ 参看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22页，第520页。

414”。¹这里所涉及的414派内部温和与极端之争，也不可忽视，它提醒我们在分析文革中群众派别（414，也包括团派）思潮时必须注意其内部的复杂性和总体倾向不能囊括的个体差异性。

最后，还要谈谈清华造反派中的两派，和中央高层斗争的关系。中央文革小组对蒯大富为首的团派的支持，是公开的，团派也从不回避他们要充当中央文革派的“铁拳头”。而414有没有后台，却始终是一个谜。直到近年414的头头纷纷写回忆录，他们都证实414在中央确实没有后台。但414的杨继绳却谈到“周恩来是同情414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的”，²孙怒涛则说：“在我们心目中，周恩来是414的精神后台”。他对此有一个解释：在刘少奇垮台以后，中央仍然存在所谓“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就是一次两派间的公开冲突。周恩来处于这两者之间，他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支持“新文革”，但在理念、情感以及人事关系上又显然倾向于“旧政府”（即传统的官僚政治），有人就把周恩来视为“旧政府”的代表。³在对待群众组织问题上，他也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支持激进造反派，在蒯大富的平反上他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但他又希望群众造反走上理性道路，希望恢复正常秩序，因此对团派在批斗王光美时的“背后搞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的“恶作剧”提出尖锐批评。⁴这也就决定了他在理念与感情上倾向温和造反派，孙怒涛甚至认为温和造反派是“他的社会基础”，这是不无道理的。⁵一位曾参加中央文革记者站材料组工作的414的成员就回忆说，他在负责整理全国各地造反派材料时，就明显感觉到，总理身边的人对于温和派造反派组织“比较关注”。⁶周恩来与414派确实没有具体联系，但他又是领导中枢中唯一没有批评过414的（毛泽东对414就公开表示不满），在蒯大富单方面成立清华革委会时，他以“没有实现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58页，第557页，第559页。

² 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9页。

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08页，第607页。。

⁴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09—111页。

⁵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07页。

⁶ 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9页。

两大派联合”为理由，拒绝出席成立大会，蒯大富说：“总理给我们当头一棒”，也可以说，在关键时刻周恩来维护了414派的权利。¹这当然都不是偶然的：和团派的“彻底砸烂论”体现了“新文革”派的意志一样，414思潮的“红线主导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了周恩来所倾向的“旧政府”派的理念与诉求的。“清华两派斗争实质上是中央两派斗争在基层的典型反映”，“上有所动，下必有乱”，事实就是如此。²

4. 文争到武斗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有言：“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属“正常”，无党无派就会出现“千奇百怪”的事。在群众组织中，因为理念与利益诉求的不同，形成不同派别，相互竞争，监督与制约，本应是政治常态。但在中国，在文革中都不允许存在，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产生了谁也没有预想到，谁也不愿意见到的严重后果。孙怒涛在他的回忆里，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重要事实：“团派总部和414总部，基本上都是本派中的鹰派占据着主导地位，鸽派仅起牵制的辅助的作用”，“鹰派的特点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信奉斗争哲学，与对立派毫不妥协，而且政治能量极大。鹰派的政治敏感性极强，极善于捕捉和利用对方的错误，并以自己的过激反应为对方的反击提供口实和机会。由此，两派的冲突与争斗，犹如钱塘江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浪盖过前浪”。³而易于被最激烈的鹰派操纵裹挟，这正是带有很大的非理性成分的群众政治的特点，也是其政治不成熟性的表现。

清华两派的博弈，一开始就落入了这样的陷阱，并显示出暴力化的倾向。最初，围绕干部问题的大辩论，还是理性的；后来成立“四一四串联会”，就遇到一个问题，学校的舆论工具（主要是广播电台）被团派垄断，于是，就有了第一个强夺总部广播台的“革命行动”，用孙怒涛以后的反省的说法，“开创了用暴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先例”。而蒯大富也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宣布“414是非法组织，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一部分”，并下令从此“不准

¹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12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07页。

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07页。

广播 414 的一切文章”。这样两派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以后虽有了一个“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的《四项协议》，但很快就被撕毁，终于导致两大派的正式分裂。¹两派所着重的已经不再是政见争辩，而是赤裸裸的权力的争夺；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再是“文攻”，重心更在“武卫”，文攻不过是制造舆论。两派关于干部问题的论争变成相互揪斗支持对方的干部：12月24日，团派绑架、殴打和秘密关押了四派大力保护并推举进革委会的干部吕应中；1月6日、9日、20日团派又查抄了20多名支持或同情414派的中层干部的家，一些被打伤，一些被抓；1月30日（春节）任职四派总部宣传部的罗征启在家中被绑架；4月4日团派保卫组的一些人抓走了罗征启之弟罗征敷，毒打后用棉纱堵嘴，活活闷死；4月14日、15日，团派关押了与罗征启一起支持414的四名干部；作为报复，四派也抄了支持团派的干部陶森的家。

斗争日趋激化，武斗遂不可避免：1月3日，两派为争夺学生12号楼中的原四派一间广播室，发生了第一次有数百人参加的大规模武斗；4月23日，团派决定要与四派决战，主动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日大武斗”，声称要“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反革命的暴力，痛歼四一四思潮，捣毁清华地下复仇军”。给出的公开理由有二。一是“没有武卫就搞不了文攻”，再不搞武斗，“革命干部从此就要离开我们，战士们也灰心丧气，纷纷不干了”，“我们的队伍就要分裂、垮台了”，显然想用武斗来解决自己的统治危机，维护掌权地位。二是“清华的问题不只是清华的问题，非中央过问不能直接解决”，“只要我们挑起武斗，扩大事态，就迫使中央表态，于我们更加主动”，这就更是一个政治谋略了。²蒯大富后来反省这段历史时，也承认，他是出于“投机心理”：在3月29日，北大聂元梓派挑起武斗，就得到了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我们也想学这样做”，清华打起来，“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414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状态”。没想到中央就是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想回头都回不来了”。³这时北京市委和卫戍区采取的是毛泽东所肯定的“四不”方针，即“不怕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56页，第469页，第473页。

²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1页，第13页。

³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64——365页。

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直接导致了清华武斗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谈及百日武斗的责任，孙怒涛认为团四两派都有，但主要责任“在上层，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首先倡导“文攻武卫”，以后又放任不管，这才造成武斗不止的局面。¹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清华百日武斗的残酷性、悲剧性是出乎人们想象的。仅5月30日那一天，武斗持续11个小时，团派投入300多人，死亡2人；四派投入300余人，死亡1人，两派共有250多人受伤。武斗中还动用了武器，更有大量自制的土武器，土枪、土炮、土坦克、土迫击炮、土炸弹、土手榴弹、土炸药包等等。人们说，作为全国著名的工科大学，清华在百日武斗中，“不但成为一处武斗厮杀的战场，而且成了一座武斗武器生产的作坊。这不能不说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的一个悲剧”。²更难以接受的，是青年学生的无谓牺牲。孙怒涛的清华文革回忆里，最沉重的一页，就是写到“在百日大武斗中有好多师生死亡伤残，他们是最惨重最无辜的受害者，其中尤以孙华栋、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钱萍华的冤死更令人无比痛惜！没有参加武斗的孙华栋是在夜晚骑车经过一教被抓后活活打死的。朱玉生是深夜在科学馆外值班放哨时被闻亭上的暗哨开枪射杀的。杨志军是在科学馆内瞭望时被冷枪射杀的。杨树立是土坦克从动农馆返回焊接馆途中被二校门西南角小山包地堡里射出的冷枪射杀的。钱萍华是从苏州老家返校时在主楼广场被9003大楼射过来的冷枪射杀的”。³令人震惊的，不仅是受害者生命的死亡，也包括射杀者良知的丧失。这些清华佼佼学子本应该有一个美好的青春，却卷入文革群众政治的绞肉机里，成了无辜牺牲者。我们将这些受害者一一记下，就是要铭记这一段充满沉重教训的历史。

而且我们要反思：这一切是怎么发生、为什么发生的？这也是这些年陆续出版的回忆录和研究著作着重总结与讨论的。它追问到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他们的理想、信念、伦理、思维、情感、行为方式——等等，其所包含的历史教训，有许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24页，第627页。

²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0页，第255页。

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701页。

有研究者将这一代人的精神素质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对理想的憧憬，对精神的倚重，对英雄的崇拜，对道德的敬畏，对集体的皈依，对政治的热情”。¹应该说这一概括是抓住了要害的：“理想”、“精神”、“英雄”、“道德”、“集体”、“政治”，确实是这一代人生命的关键词。问题是如何评价和对待。有人因为这一代人最终被利用，并且造成严重后果，把他们视为被“骗子”和“疯子”蒙蔽的“傻子”，从而对这一代人的追求与相应的精神素质，予以全盘否定：这很难说是科学与历史的态度。于是又有人（主要是历史的当事人）鉴于当下中国理想、精神、道德、集体观念以及政治热情的缺失，主张对他们当年的追求予以基本肯定，“注入正确的内容，就能重燃政治热情，重建民主意识，重塑理想主义”。²这样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还是有点简单化。或许我们应该采取更为复杂的态度：对这一代人的追求与精神素质首先进行严峻的审视和反思，认真总结其中惨重的历史教训；在经过批判性的科学清理以后，再剥离出其中某些可为今天借鉴的合理内核。我们这里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初步反省与反思，而且有五个方面。

(1)对理想主义的反思

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的。首先是所谓“革命至上主义”。有人回忆说，这一代人“大多有一股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心怀“对‘纯粹社会主义’的想象”，³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唯有革命（而且主要是暴力革命）才是实现这一圣洁理想的唯一正确的途径。这样，他们在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圣洁化的同时，也把革命神圣化了。于是，就有了“革命至上主义”。研究者说，革命至上就是“把革命的价值看得高过一切，高于物质享受，高于文化、科学、艺术，高于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⁴在这样的基本信念基础与前提下，就引申出两个影响深远而恶劣的理念。

¹ 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第272页，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出版。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81—683页。

³ 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60页。

⁴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与演变》，第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首先是“为革命可以牺牲一切”。我们注意到，文革中许多破坏性行动，例如“破四旧”对文物的摧毁，批判封、资、修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践踏，破除“旧规章制度”对生产的破坏，鼓吹“划清阶级界限”对人伦关系的冲击与扭曲，“斗私批修”对个人权利、欲望、利益的全面否定和剥夺，以及武斗中人的生命的无谓牺牲等等，无一不打着“革命”的旗号。套用罗兰夫人的话，真的是“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¹这样的革命高调对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特别具有欺骗性与蛊惑性，他们怀着“为革命牺牲”的神圣感、悲壮感，冲在“砸烂旧世界”的第一线，武斗第一线，轻掷青春与生命，付出了令人痛心的代价。

更应该质疑的是“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政治斗争（革命）无诚实可言”。²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中盛行一个潜规则：“大方向对了，一切都对”，只要是有利于革命，“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断章取义，小事扩大，无限上纲等等，均被视为小节，不会追究”。³这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个“政治利益与政治道德”、“革命与道德”的关系，在政治斗争中要不要坚守“政治道德底线”的问题，⁴更有一个要不要受法律的制约的问题⁵。在更深层面上，则有一个所谓“革命原则与人性良知的冲突”。如论者所说，“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其他任何一切，包括情感、人性、人道主义，在革命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因此才有雨果、狄更斯等作品里“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性”这一新伦理的提出。⁶文革更是把“革命”推向极端，而将“人性、良知”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反动思想”痛加批判，极度排斥，就出现了不断“突破做人的底线”的人性悲剧。⁷在总结文革历史教训时，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从“拷问良知”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44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22页。

³ 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3页。

⁴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480页，第475页。路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29页。

⁵ 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96页。

⁶ 王允方：《求索与启蒙》，《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04页，第105页。

⁷ 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63页。

开始，要重新建立以维护人的良知、人性为核心的新的“道德价值观体系”，¹这是抓住了关键的。

文革群众政治中不择手段的革命方式就为在中国民间社会本来就颇有传统的流氓无产者、流民文化打开了大门。有研究者就指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兵家的斗争哲学与法家的专制理论与民间流民文化的造反运动相结合”，²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从1967年夏季开始”，“社会底层的武术团体，甚至流氓帮伙，逐渐成为各派拉拢的对象。这些人将自己的语言、习气逐渐带入文革社会，特别是这些流民与某些红卫兵在草莽豪爽、蛮横自负方面很快接近起来，形成了深刻影响文革的痞子文化气质”，“显示出文革与痞子社会深层关联的一面”。³也可以说，文革群众政治和群众领袖中的痞子气，正是民间流民文化传统与不择手段的革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应该都是文革的负面，很值得注意。

这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是绝对的英雄主义和道德主义。那个时代盛行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格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但研究者说的“救世主情结”也是掩饰不住的：“红卫兵们把自己的使命和义务急剧地、无限地放大：君临天下，担当朝纲，救生育民，皆不在话下”。⁴问题是，这样的救世英雄的自我崇拜（作为群体就是“群众崇拜”）是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互为依存的，这就意味着这一代人外在的霸气是与内在的奴性纠缠为一体的，还是逃不脱鲁迅早就说过的“对上（领袖）为奴才，对下（芸芸众生）为主子”的中国传统。同样，和前文所说“道德虚无主义”纠缠为一体的还有“高调道德专政”。文革在一开始就提出了要造就一代“新人”，创造所谓“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世界，并提出了“无限忠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道德高标，占据了道德的高地，而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一代，都是怀着道德的崇高感、神圣感去投身于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政治》，第704页。

² 汪澍白：《影响毛泽东最深的传统文化四大家》，《毛泽东的来踪去脉》，第314页，自印本。

³ 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辈的回忆》，第11—12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

⁴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99页。

革命的。问题是这样的“高调道德”不仅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绝对性，是不容置疑的“圣人道德”，而且有极大强制性，与“立四新”同时进行的“破四旧”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更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思想改造，还有一系列的忏悔、赎罪的准宗教仪式，这确实是一种“道德专政”。¹这样，我们就在这一代人理想中的英雄情结、道德情结里，都看到了专制的内质，这是不必回避的。

(2) 对集体至上主义、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的反思

集体至上主义也可以看作是革命至上主义的延伸，因为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集体性的，而且是有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行为，它所奉行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因而要求绝对服从作为集体意志的集中代表的党的意志，并无条件地放弃、牺牲个人利益。应该说，这样的集体至上、党的意志、利益至上的原则，是早已确定的，对在共和国成长的这一代的影响，也是由来已久的。在文革中自然延续下来，但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

我们关注的是，文革时期由于毛泽东对群众政治的极力推动，我们讨论的“集体”就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出现了只接受毛泽东与党中央的领导，不受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像团派、414派这样的群众组织。在这样的群众组织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就有了一些时代与历史的新特点。正如一位414的成员在回忆中所说，“探讨文革中的群体行为、群体与个体关系是一个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问题”。²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之前与之后受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相比，相对松散，个人的参加与退出要自由得多。总体来说，加入某个群众组织，特别是团派、414这样的群众派别，大都是对其政治倾向、主张的认同。但如果深究起来，就有更复杂的内容。一位历史当事人在回答后人的问题：你们当年参与群众政治，以致武斗，

¹ 参看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303—304页。

² 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42页。

动机何在？（在提问者看来，这是“匪夷所思”的）时，这样说：“当时的我们，在理想主义的光环下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和英雄情结，而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还有某种危机感和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强烈诉求。当然，也不排除青年人追求惊险浪漫刺激的猎奇心理”。¹这里特意提到的“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危机感”，也是人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到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²这是个人完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极权社会统治下的普遍社会心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统治者（毛泽东）意志的变化莫测，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个人遭遇的大起大伏，都使全社会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有不安全感，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惶惶不安，以致恐惧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心理下，格外突显出个体的孤独与无力，就特别渴望到某个群体中寻找庇护。首先是获得政治的承认：在文革严格的政治等级观念与体制下，最重要的是人的政治身份，参加群众组织，就意味着获得了“革命群众”的身份，有了参加革命的资格，这就有了基本的安全感。而且加入组织以后，这样的不安全感、恐惧感依然存在，也还要争先恐后地表现对组织的忠诚，害怕落后于他人而被淘汰。越是原先的身份（家庭出身，个人历史，社会关系）有问题，在群众组织中越是表现激进，就是这个道理。有人因此说：“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话有些偏激，但也不是没有根据的。³

在更深层面上，还有利益的趋同：前文谈到文革中奉行“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失去一切”的政治逻辑，自己参加的组织掌了权，个人就成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就自然有了一切；掌不了权，或者掌权又失去了权力，个人也失去了一切，甚至有成为“反革命”的危险。这样，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就成了一个以掌权（而不是政治信念）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个人彼此之间是有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命运密切相连的关系的，这是正常年代很难达到的。这样的文革中的个人对群体的趋同性与归属感，或许是今天这个原子化的时代里的人所难以想象的。文革中极易结成“死党”，不仅是政治观念、理想的同一性，

¹ 孙耘：《我的文革心路历程》，《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140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20页，第529页。

³ 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转引自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63页。

更是利益与命运的休戚与共。而且这样的趋同，在今天还影响着历史当事人对文革的反思，人们很难摆脱当年的派性，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那么死心塌地地忠诚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心存离心力，或者持被动、消极态度的大有人在，有时（特别是在运动中后期）更可能是大多数。“死党”（文革中叫“铁杆XX派”）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但不能忽视他们的影响与能耐。这就是前文引述的414头头孙怒涛所说，在文革群体政治的派别斗争中，群体的思潮和行为往往受思想最激进者，特别是偏激的领袖所左右。这就涉及到文革群众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它主要是一种街头、广场政治。对这样的广场政治，我有过这样的描述：当无数的个体，聚集在同一个空间下，发出共同的呐喊，“无数个个人的声音融入也即消失在一个声音里，同时也就将同一的信仰、观念以被充分简化，因此而极其明确、强烈的形式（通常是一个简明的口号或歌词）注入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深处，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和力量。处于这种群体的意志和力量中，个人就会身不由己地做单独的个体所不能、不愿或不敢做的事。这是一个个体向群体驱归又反过来为群体控制的过程”。¹如果说前文讨论的是个体“向群体趋归”的问题，那么，这里提出的个体“为群体控制”的问题，在考察文革群众政治时，或许是更为重要的。

其中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在街头、广场政治中，最有力量，对群众最具控制力的声音，是把问题极度简化，最激烈，非理性，直接诉诸情感，极具煽动力，因而也最简单、明确的声音，是堂吉诃德式的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登高一呼；而哈姆莱特式的充分考虑到问题复杂性，因而犹豫不决，言辞纠缠难懂，温和、理性的声音，是根本没有人听的。其结果就是每一个派别的观点都被极端化，而失去（或减弱）其合理性，²而行动更最容易走向非理性。其二，群众之所以听从这样的极端言论，做出“单独个体不能、

¹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第50页，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

² 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尽管414的头头都再三声明，《414思潮必胜》有可认同处，但总的倾向“太右”，是414派中的激进派，不能全面代表414思潮，但人们（包括今天的研究者）都仍然把它看作414思潮代表作，原因即在群众政治中任何派别都在实际上被自己内部的激进派代表了，这是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参看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头头的心路历程》，第558页，第559页，第565页。

不愿、不敢做的”非理性的行为，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广场效应”：身处广场（街头）这样的群体空间里，每一个个体都淹没、因而也就隐名在所谓“群众”的茫茫大海里，无须对个人的言行负责，这就是所谓“法不责众”。而言行一旦不受法律的制约，“无法无天”的结果，最后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甚至走到主观愿望的反面，产生自己完全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这是群众政治的悲剧所在。其三，最严重的，是研究者所说的，在群体的裹挟下，每一个个体的“人性中恶的一面”都被诱发出来，尤其是群众领袖更会“利用他在群体组织的权力地位”，发泄其内心的邪恶欲望，“由群体的公仆变成群体的主人”。¹这样的“文革新贵”几乎是文革群众政治的必然产物。而对每个参与群众政治的个体的人性恶的诱发，或许是更值得注意的。我曾经说过，每个人的人性本是善恶并举的，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就会扬善抑恶，但一旦正常社会秩序被打乱，政治生态环境被破坏，就会是扬恶抑善，导致人性的大堕落，大倒退。不幸，文革正是这样一个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性恶性发展的时代，这是许多人“不由自主”地投入残酷的武斗的人性原因。这样的“人的动物化”应该是文革群众政治最严重的后果，是文革的最大罪恶。

(3)对斗争至上哲学的反思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青年毛泽东的人生格言，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同样后果严重：那个时代的“与天奋斗”，征服自然，越演越烈的结果，是今天大自然对人类的全面报复；那个时代的“与人奋斗”，开启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恶斗的先例，至今未歇。这一代人，至少在文革期间，是信奉斗争哲学的，它是文革期间两派内战的思想根源，也给文革中的群众政治打上残酷斗争的印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政治基础的。在毛泽东的“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这一代所受到的教育就是“时刻提高阶级警惕，随时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对群众组织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充当阶级斗争的尖兵”。

¹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31页。

这些教育与要求的实质就是研究者所说的，灌输“泛敌意识”，把所有的人都看是“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实际生活中即使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即所谓“‘假想敌’的泛化”。¹于是，所有的不同意见，都会上纲上线为“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两派争论自然就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表现”。由此形成的“用最大的敌意看待他人，处理与不同意见者的关系”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充满“仇恨”的阴暗心理，影响是深远的。

其二，这是一种把斗争绝对化的哲学，其内涵有二。一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是同志就是敌人，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只有对立面，而无同一性”。²二是把一切矛盾与斗争都视为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个取代一个，一个吃掉一个。文革群众政治中的两派，激进派和温和派，团派与414派，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势不两立，有他无我，最后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其三，崇尚暴力。在文革中风靡全国的毛泽东的这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³是可以概括文革群众政治中的革命观的，因此，从开始的斗黑帮，破“四旧”，到最后的武斗，暴力是贯穿文革始终的。研究者由此而判定文革是将“灵魂革命”与“肉体革命”统一为一体的。⁴这不仅暴露了文革空前的残暴性，而且揭示了其“无法无天”，反民主法治的本质。这就是蒯大富说的，“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⁵这也是文革群众政治的一个要害。人们总结文革经验教训，最后都归结到民主法治建设，建立“民主基础上的法制与法制保障下的民主”，这都抓住了关键。⁶

¹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301页。

² 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64页。

³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⁴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84页。

⁵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88页。

⁶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99页。

(4) 对绝对思维的反思

前文所说斗争哲学本身即是绝对思维的产物和表现，这里讨论的“绝对思维”重点又有三个方面。一是论者说的“高举真理的大旗来垄断真理”。¹考察文革中两派论争，就可以发现，每一派都不容置疑地宣布自己的观点、主张的“政治正确性”，而且是先验的正确性，实际上就将自己的或许有一定合理性的观点夸大化、绝对化、神圣化，以致真理化了。于是就以真理的代表、化身自居，将真理垄断起来，不仅将不同于己的对方观点妖魔化，而且借助于政治权力，以“政治不正确”的罪名，将对方置于死地。其二，这样的自我真理化的背后，是论者所说的“排斥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历史道路等的多样性，否认不同的价值观存在的权利”的绝对思维。其三，这样的绝对思维又是“单一的思想资源、垄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化”的产物。恰恰暴露了这一代人“青年时期的（封闭的，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失去了与传统与世界限制的联系”的基本弱点。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文革经验教训的总结：“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但是警惕‘政治正确’的诱惑，不要极端思维方式”。²

(5) 对“不知妥协”的反思

今天回顾文革期间的两派斗争，确实不能不有许多的感慨：本来，由于政治观点，对社会问题看法不同，以及背后利益诉求的不同，文革中出现两派，是正常的。其实凡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派别，任何社会都是如此。具体到我们这里讨论的清华文革，在团派基本掌握了学校的大权，作为反对派的414派的出现，既是必然，也属正常。而且从理想的政治生态看，如果有一个“负责任的、起积极作用”的温和派的反对派，对实行激进路线的掌权派起一个监督、制约的作用，那是能够促进清华文革的健康发展的。孙怒涛

¹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4页。

² 郑易生：《反思极端思维方式》，《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63页，第264页，第266页，第267页。

在他的回忆录里设想：“这（将）是一条‘议会道路’（即414参加革委会与团派建立‘联合政府’），是一条对两派都有利的双赢道路”。但这在文革时期，甚至在今天的中国，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大权独揽”，绝不和其他政治势力分享权力，是中国的基本国家体制，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是坚持不动摇的。在独揽权力这一点上，团派和414是一致的，分歧仅在由谁来独揽。而且如孙怒涛所说，“经过文革前的反修教育，认为妥协、让步、忍耐都是机会主义的，都是投降派的所为，只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才是最革命的”。而这恰恰是应该总结的历史教训：“团派和414都不懂得在政治斗争中让步和妥协是必要的，不懂得在争取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同时，也要从对方的角度设想并照顾对方关切的利益，不懂得一方全胜一方全败的结果只能导向下一次更强烈的对抗并且两败俱伤，不懂得妥协，就会双赢。只想着对抗，必然是零和的结局”。¹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新认识：“妥协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就是妥协的政治。因为民主讲的是共存，并不是这一派要完全吃掉另一派。要共存，一方面要善于斗争，一方面还要善于妥协”。²这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出的结论，弥足珍贵。³

四. 造反派红卫兵运动历史的终结

1. “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的前因后果

让我们再回到历史的现场。从1968年4月23日团派主动挑起武斗，到7月26日，两派内战不止，史称“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到7月27日清晨，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北京市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86页，第690页。

² 路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30页。

³ 直到今天，文革群众政治的这些历史教训仍不失其意义。比如“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逻辑仍然在支配着许多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依然盛行“以最大恶意看待他人”的敌对思维；在网络空间里，占支配地位的依然是非理性的极端观念和极端思维，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二元对立；把自己的意见真理化，将不同意见妖魔化的绝对化思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个灭掉一个，不容任何妥协的斗争哲学，更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新的国民性，形成了一个传统：从文革（还可以追溯到更远）到今天，绵绵不绝，并且已经造成了今日的中国社会民意分裂，国民之间失去共识的严重后果。这是应该引发警惕、深思与讨论的。

61 个单位 3 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 部队）的军代表带领下，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当时两派参加武斗的不足千人。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团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顽强反抗，血战 12 小时，造成工宣队 5 人死亡、731 人受伤、143 人被抓，100 多名的团派人员被扣押的严重后果。但最后，明白了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图以后，团派全部撤离清华，工宣队全面占领清华校园。“清华大学文革再一次在全国文革发展中成为转折的关键点”，标志着造反派红卫兵运动历史的终结，也就意味着文革群众政治的终结。¹

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造反派红卫兵运动、文革群众政治的终结者和发动者，都是毛泽东。这是怎么回事？这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前文说过，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试图以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取代旧官僚政治的一次大实验。在某种意义可以说“独裁政治——群众政治——官僚政治”三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文革的基本内容，并构成了文革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毛泽东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的关系。我们在前文的讨论里，比较强调文革群众政治对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政治的依附性，这确实是两者关系的主导方面，而且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但如果把这种依附强调得过分，也会对历史的复杂性形成遮蔽。从表面上看，在文革中毛泽东得到了全民的拥护，所有的群众（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造反派中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宣称忠于毛泽东，宣誓紧跟毛泽东，而且在主观上确实都是真诚的，毛泽东也正是以这样的全民拥戴作资本，并直接发动群众来对付党官僚的。但稍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一个基本事实：群众是有利益区分的，特别是他们组织起来（这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政治最关键的一环），就更加自觉地追求本组织、本派别的利益，而且要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来理解毛泽东，解释和执行他在文革中的“最高指示”。同是拥戴毛泽东，造反派是因为他是“反抗官僚特权的带头人”，保守派或温和造反派则因为他是“十七年官僚政治的代表”，而且他们都可以找到毛泽东的

¹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第 14 页，第 26 页，第 31 页。

相应语录来作依据。这就是说，每一派的群众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在文革中的两派群众斗争中，是看得很清楚的：每逢毛泽东最新指示传达下来，认为毛泽东的指示符合自己的利益的那一派，就欣喜若狂，高呼这是“毛主席的最大支持和最大关怀”；另一派发现于己不利，就尽量低调“冷处理”。更有甚者，就像研究者说的那样，每一派都想把自己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实际上是本派别对文革的利益诉求说成是唯一正确的，从而把自己这一派打扮成“正统”的毛泽东思想路线的阐释者、执行者和捍卫者，以此作为掌权的依据，并将对方横加“反毛泽东，反文革”的罪名。¹这就是说，当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政治时，也是冒了风险的：在他利用群众时，群众也同样在利用他，尽管开始时不自觉，随着运动的深入也会越来越自觉。实际上每一个群众组织都是以自己的派别利益为中心的，文革中后期不断提出要“反派性”，批判“多中心论”，收效甚微，原因即在于此。这也就意味着，群众在拥戴毛泽东的同时，也裹挟了毛泽东；在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也会曲解，修正，放大或缩小毛泽东的原意，产生毛泽东没有预计到，甚至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毛泽东后来总结文化大革命时，就谈到没有想到会出现“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局面，并承认这是文化大革命犯的“两个错误”。²虽然这或许并非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却难逃其责。所谓“毛泽东个人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的结合”并非理论上想象的那样绝对与完满，整合得天衣无缝：总体是统一的，但会有偏差，甚至背离；总体是有效的，但也会打折扣，甚至无效；总体是可控的，也会有失控。

更大的风险还在于，毛泽东为了推动群众政治，提出“造反有理”，后来社会又流行“怀疑一切”思潮。这本来是有条件的，即不能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不能怀疑毛泽东本人。但这样的造反、怀疑思想一旦为群众掌握，就会按自身的逻辑，引向对毛泽东的怀疑，以至对党的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这样的群众政治发展的不可控，就越过了毛泽东的底线，是

¹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101页，第102页，第171页。

² 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转引自逢先知、金仲及：《毛泽东传》（下），第1770页。

他所不能容忍的了。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部分造反派的“极左化”，成为“异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1968年初，就出现了“省无联”思潮。其代表作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我们的纲领》里对文革的发展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尽管在去年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但是批判局限于对个别人的罪恶的揭发，而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落在官僚们手中”。¹另一篇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里也指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等于把已经“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于是，就提出绝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变成“罢官运动”、“改良主义运动”，“社会需要彻底的社会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群众专政”。为此，就需要重新建党和重新建军。²这里提出的“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论，与团派“砸烂”论，似乎有些相似，但却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不再针对具体的党组织和领导人，而是要作根本的制度层面的追问，从国家体制的改革上去解决产生官僚特权的政治、经济根源，这就触及到了现行体制的核心“一党专政”的问题。而这正是无论是文革前的官僚政治，还是文革中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政治都一致划定的不可逾越的红线，也是激进造反派（更不用说温和造反派）绝不敢触动的底线。因此，其所引起的文革高层领导的反应也是空前强硬的。在接见湖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周恩来一语道破：“他们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样评价建国十七年的问题”，这大概就是前文说的和“旧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最为关心、也最敏感的。而“新文革”的重要代表康生把问题看得更重：“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那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

¹ 《我们的纲领》（1968年3月），收《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300页，第302页。

²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280页，第294页，第277页，第291页，第284页。

掉了”，“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由此得出的结论：非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无产阶级不可，非推翻毛主席领导不可”。¹可见无论“旧政府”还是“新文革”这党内高层的两大派在文革观念上有多大矛盾与区别，但面对对党的合法性的质疑，他们维护党的绝对统治的利益上还是高度一致的。而毛泽东本人的态度也是鲜明而坚定的：早在此之前，他就发出过指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²现在，省无联提出要砸烂旧国家机器，就更为毛泽东所不容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在1968年还要面对的难题，就是毛泽东说的“全面内战”，从1967年7、8月间到1968年夏季已经持续了一年。本来，这样的全国性武斗就是毛泽东为对付有可能失控的军队，发出“武装群众，文攻武卫”号召的结果。现在，毛泽东又感到了掌握了武器的造反派失控的危险。引起高层震动的，是广西两派（偏于保守的“联指”和激进造反派“四二二”）的武斗，到1968年春末夏初进入白热化以后，接连发生“抢枪事件”：先是“联指”一派抢了14门六0炮，一万四千多支枪；“四二四”派又截获中国抗美援朝部分军用物资，仅柳州就抢了1700万发子弹。³所谓“抢枪”，对于大多数造反派来说，是因为对方得到军队支持，为了自卫而不得已的行为；而更为激进的造反派，按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里的说法，就是一种建立“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实行“武装的群众专政”的自觉努力。⁴这样的武装起来、而又失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正是文革高层最为担心的，于是断然采取行动。1968年7月3日，发布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通告（简称《七·三布告》）；7月24日，又发布制止陕西武斗的《七·二四》布告，都把矛头指向激进造反派，并且下令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陕西部队进行弹压。用毛泽东7月28日讲话的说

¹ 《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的讲话》（1968年1月24日），《陈伯达文章讲话汇编》，见中国文革研究网。转引自白承旭：《文革的政治困境与陈伯达与造反的年代》，第121页。台湾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² 《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第8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³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武斗”》，第249页，第250页。

⁴ 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284页。

法，“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决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¹这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禁止造反，再继续就要镇压的信号。

这时候，还发生了所谓“北航黑会”事件。到了1968年夏全国造反派都面临严重危机，纷纷组团上访，寻求支持。于是，由广东造反派出面，7月16、17日在清华、北航开了一个全国形势座谈会，无非是交换情况与意见，会上有人提出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或联络站，当场就有不同意见，并未形成任何决议。²但仅是有“组织起来”的意图，也引起高层的高度警惕。文革的“结社自由”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一条红线：绝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因为那会形成准政党：这可是中国一党专政体制之大忌。

在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的会上，气氛十分紧张。康生开口便说：“今晚不是讨论代表哪个的问题，是讨论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是讨论执不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的问题”，周恩来也厉声指责：“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掠越物质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批判的重点是所谓“北航黑会”。吴法宪质问参加会议的四二二头头：“你有什么资格召开全国几十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力？谁给你的任务？”陈伯达逼问：“你们造谁的反？你们要假借名义造无产阶级的反”。康生更无中生有地断定：“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康生还特意追问：蒯大富是怎么讲的，可见已经盯上了他。³此刻在“中央首长”（即所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眼里，武装起来又图谋组织起来的不受控制的造反派已经成为一只有可能与党对抗的力量，用林彪的话来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⁴这就非灭之不可。

一个月之内，连续发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以及“七二五讲话”，这样的密

¹ 《毛主席和聂元梓、蒯大富等五大领袖谈话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的精神要点》（1968年7月28日）。

² 秦晖：《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领导者》2015年第8期。

³ 《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1968年7月25日），《陈伯达文章讲话汇编》。

⁴ 林彪在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时的插话（1968年7月28日），转引自秦晖：《从文革的清华与广西说起》，《领导者》2015年8期。

集动作，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最高司令部已经决心要对造反派动手，彻底结束文革群众政治的历史。但在操作上却又用尽心机：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出面，连下三步棋，再由毛泽东最后“收官”：不打任何招呼，密令工宣队3万人于7月27日突然进驻清华大学。其目的就是“解决清华一个点，影响全国一大片”，用“非常规的手段”以取得“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效应和震慑各地造反派的强劲威力”。这也算是毛泽东的一个“绝招”，毛式独裁政治的一次精心表演。¹

但这样做的后果却极其严重。先从清华这一面看。在历史当事人的感觉里，这是一个历史的循环：“毛从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入手介入清华文革，最后还是采取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²还有一个相似的细节：刘少奇通过夫人王光美担任工作组顾问操纵清华文革，而毛泽东也派自己身边人迟群、谢静宜担任工宣队负责人，将清华文革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最后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来解决问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57年反右运动也是靠“工人说话了”来收场的，这两者之间似乎“形成了微妙的连接”。³这样的联想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文所说，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是把文革视为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工作组也是据此将蒯大富等工作组的反对者当作“新右派”而残酷打击的；现在，毛泽东要将造反派赶下历史舞台，也是将其视为反党右派而无情镇压的，依靠的力量仍是工人阶级。这样，毛泽东就在实际上回到了刘少奇的文革路线。这也就意味着，文革初期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是要利用群众政治来整治官僚政治；现在，他又回归官僚政治的观念与思维，就彻底放弃了他一手扶植的群众政治。经过这样的反复，人们终于看清：“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文革不过是毛泽东的“初期用左手打右手，中后期用右手打左手”的政治游戏，⁴前后不变的是让所有的人（从官僚到群众）都臣服于自己，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29页。

² 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页。

³ 白承旭：《文革的政治困境与陈伯达与造反的时代》，第140页。

⁴ 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23页。

让个人独裁政治一统天下。

同样是把造反派赶下历史舞台，对处于天子脚下的清华，采取的方式是相对温和的；而在边远地区的广西就要露骨、残酷得多。研究者告诉我们，在“七二五”接见不久，与会的四二二的代表便全数扣押入狱，并开始了全省范围的对造反派的围剿。统计数字表明：文革中广西有八万四千余人死于非命，其中近五万人死在《七三布告》发布后的镇压中；死于两派武斗的有3312人，其余96%都惨死在武斗结束后的屠杀中。这说明，“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都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或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的屠杀中”，“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与‘重建秩序’的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统治下，也即官僚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新结合之中。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文革造反派历史的总结：“清华无疑是造反派被利用（后来也被镇压了，但非最惨）的典型，广西则是被镇压（先前也曾利用过，只是价值不大）的典型。两者合起来倒是构成了中国文革最完整的典型图景——尤其是造反派由兴到亡整个生命历程的典型图像”。¹

2. 最后的接见

先从一个细节说起。7月28日凌晨2时多，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周恩来向他报告了工宣队进驻清华找到了团派反抗，发生了流血事件，毛泽东听后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²这样的本能的反应是能够反映毛泽东与造反派的复杂关系与感情的：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发动与支持造反派造反，当然十分自信，造反派不会造自己的反，而是可以用来造自己的对手党官僚的反；但随着运动进入恢复秩序的阶段，毛泽东需要再度起用经过造反派的冲击纷纷表示驯服自己的党官僚，但已经在造反中获得利益的造反派，却依然

¹ 秦晖：《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领导者》2915年第8期。

² 转引自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19页、

坚持在毛泽东看来已经“无理”的“造反”，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时毛泽东就开始担心，造反派有一天会“真的反了”，反到自己头上，这是他未雨绸缪将工宣队派驻清华的真实原因。脱口而出的一声“真的反了？”是反映了毛泽东对造反派既相信（希望）他们不会反自己，又忧虑他们真的会反叛的复杂心态。

于是，就有了7月28日凌晨的紧急接见：一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体成员，另一方是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这是文革最高领导层与文革群众领袖最后一次见面。按本文的论述框架，也可以视为文革中的独裁政治、官僚政治与群众政治的最后“告别”。

毛泽东首先表现出他的强硬的一面。他干脆告诉蒯大富：是自己派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领袖人物向全国造反派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把造反派赶下历史舞台，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战略部署，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不要心存任何幻想。然后厉声怒斥这些群众领袖“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警告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从错误的时候了”。问题是：小将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还是参加接见的林彪一语点破：“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运动发展到恢复秩序的“阶段”，“需要”的是小将自动让权，回到自己所在班级“复课”（表面上还可以叫“闹革命”）；但无论是团派，还是414，激进造反派，还是温和造反派都还要继续造反，热衷于内战，这就干扰了“大方向”，犯的是“不识时务”错（罪），这是必须强制下台的真正原因。至于“脱离群众”、“全身浮肿”云云，都是找出来的理由，即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蒯大富们即使有这些毛病，也不至于治罪下台。最后干脆下令：“斗批散”，“通通走光，扫地出门”，“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真正是杀气腾腾！这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落到了奉命造反的小将头上，而且真正是永无翻身之日。这是和党官僚完全不同的命运：当年他们也是按毛泽东的部署曾经被造反派打倒，但毕竟是同打江山的自家人，最后还是官复原职。这就是“内外有别”，这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

等到造反派小将明白这个道理，已经为时晚矣！

在最后的接见时，毛泽东还表现出了另一面。他一再不无真诚地表示：“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同时又明白地说：“414是反对我的”。在造反派两派之间表现出的如此明显的亲疏之感，是让同样忠于毛泽东的414派感到委屈与困惑的。¹但这恰恰是在更深层面上反映了毛泽东的内在矛盾。正如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此时（1968年7月）的毛泽东正“开始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甚至令人惊异地实行的或应用的正是‘四一四思潮’的某些观点与主张”。比如414早就主张革命小将要“让权放权”，这样才能让广大干部（党官僚）在各级领导中发挥“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他们早就批判激进造反派（团派）搞的群众政治“没有党的领导”，“打倒一切”。这当然不是偶然的：414思潮就其本质而言，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官僚政治统治下的正统观念和正统秩序的一种坚守；而1968年7月以后的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向，也正是要“回归十七年旧道”，回归官僚政治。而且这样的趋势是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的，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四一四思潮”是取得了最后的“历史性胜利”的。毛泽东实际上也在向这样的趋向妥协，不得不对他在文革初期坚持的“以独裁政治与群众政治相结合的新政治取代旧官僚政治”的路线作出修正，主要是终结、牺牲群众政治，换取个人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重新结合。²对毛泽东来说，这样的妥协和修正虽是出于要维护一党专政体制的根本利益，维护他个人独裁利益所必须；但也还是有些被动，其内心仍然不愿意放弃他的文革理想。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在他的心目中，正是自己的“群众政治与独裁政治相结合”理想的一个典范、典型。因此，团派的退出历史舞台，在某种意义上正意味着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失败与破产。现在，又要由他自己来结束蒯大富和团派的政治生命，是多少有些尴尬和无奈的。

于是，在最后的接见里，就有了这样的一幕：接见时正在抗击工宣队现场的蒯大富迟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20—623页。

² 参看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43—244页，第208页，第215页。

到了，毛泽东一直在等他。蒯大富一到，“一下就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嚎啕大哭，边哭边告状，——毛泽东流着泪，江青也哭了”。还有这样的“结束时刻”：毛泽东刚离开会场，又立刻回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他叮咛在场的中央首长：“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¹这大概就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的人性、人情这一面的一次流露吧。对此，当然不必夸大，因为蒯大富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保护”而免遭牢狱之灾；在结束造反派生命这一“大局”问题上，毛泽东是绝对无情的。但似乎也不可忽视，论者早就说过，“把专制君主当作活生生的人来描写，才能对官僚政治有更加生动而深刻的科学理解”。²

3. 历史的最后一页：工宣队统治下的清华

讲完文革造反派历史的终结，文革群众政治的终结，我们的讨论本可以结束；但为了清华文革历史叙述的完整性，还要对工宣队统治清华七年（1968年7月27日——1976年10月）的历史作一个简述。

如前所述，到1968年7月，毛泽东事实上已经逐渐向官僚政治妥协，但他仍不愿将他的文革试验点清华的领导权直接交给党官僚，而是派出自己身边的警卫部队领导的工宣队执掌清华大权，实行工人阶级的准军事专政。因此，毛泽东在7月27日将工宣队派驻清华以后，在8月25日就发表了经他审阅修改过的署名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称：坚持工人阶级领导，首先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这里说的“独立王国”显然是指以清华为代表的激进造反派的不听话的“蒯式王国”：如果说文革初期毛泽东首先要

¹ 以上关于毛泽东与中央领导接见的描述与所引讲话，均见《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²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136页。

摧毁的是以北京市委为代表的官僚政治的独立王国；那么，到文革中后期，毛泽东不能相容的就是群众政治的独立王国了：他是不允许和自己对抗的任何政治力量的存在的。于是，毛泽东又在姚文元署名的文章里，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有些自己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这里说的“叶公”显然包括蒯大富。姚文元的文章就“声色俱厉而不点名地对‘蒯氏人物’大加斥责：“那种把工人当成‘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如研究者所说，这既是对之前的文革各自为“中心”的内战的一个批判性“总结”，更是工宣队进驻清华为标志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新阶段的一个指导纲领，¹这就有了讨论的必要。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毛泽东把矛头指向了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也即作为造反派（无论激进派，还是温和派）的青年知识分子，并且宣布“工人阶级有理由专他的政”。这就意味着，文革初期充当革命先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文革派的“铁拳头”的红卫兵小将，特别是他们中的骨干，到文革中后期又成了革命对象，无产阶级专政的重点打击目标。这就有了非同小可的严重意义。如研究者所说，文革时期，清华大学乃至当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代：“一是1949年学成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二是1949年后1966年前已学成的并拥有固定专业工作的中年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年龄大都在40岁上下；三是1966年文革开始时依然在校学习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文革一开始，老一代知识分子立即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为革命对象；中年一代知识分子如掌握了一定权力也作为“大大小小的黑帮”被揪斗，一般教职员则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接班人”而备受排斥。现在，连

¹ 参看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79—281页。

作为学生的青年知识分子也以“大闹派性，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反对工人阶级”的罪名被押上革命审判台。“图穷匕首见”：三代知识分子都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对象，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真正成了一场“革知识分子‘命’的革命”。¹这是最能显示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的，他早在1958年大跃进时就宣布“对于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要）鄙视，藐视，蔑视”。²同时，这也充分暴露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反文化、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反动性。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工宣队统治清华的八年，就成了一部“不断革知识分子的命”的历史：这确实是清华大学校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据说工宣队对清华的统治是基于“两个估计”，即1949年以后的清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³据此，工宣队宣布，自己的任务与使命，就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工人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大知识分子群众”。⁴这样的任务与使命，到了普通工宣队基层干部那里，就变得十分简单：“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⁵这里被蓄意制造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彼此不相容的矛盾，也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与政治问题的，即研究者所说的，将本应该互补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异化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一方是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力量，另一方是被改造的力量”，而“这两种劳动的政治对抗乃是官僚社会的典型特征”。⁶

工宣队统治的八年，也是运动不断，每一个运动都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作为重点。首

¹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74—275页，第279页，第273页。

² 毛泽东：《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³ 见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42页注释1。

⁴ 清华工宣队：《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红旗，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教育阵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而斗争》。转引自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82页。

⁵ 一位工宣队小头目的讲话。转引自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第285页。

⁶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第15页，第16页。

当其冲的是文革派头头，工宣队一进校，就给头头办学习班，追查杀人凶犯，整肃派性。¹以后又发动清查“五一六运动”，借此对造反派进行彻底清算。蒯大富就被揪回学校，隔离审查了三年。²孙怒涛也被批斗，写了好几个月的交代材料。许多分在外地的清华学生，无论是团派，还是414派，只要参与了文革造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有的被整的惨不忍睹，还有自杀的”。³从此，“造反派”就成了一个洗刷不清的历史罪名，两派（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毫无例外。两派之争，没有一方是胜利者。在讨论“清华文革谁是胜者”时，回答只有一个：保爹保妈、永不造反的“八九派”，即红二代“笑到最后”。“‘爹妈’们一旦重掌大权，立即整肃激进造反派，遗弃保守造反派，为他们的官二代上位扫清障碍，铺平道路。不仅‘龙生龙子’更要‘龙传龙位’”。“‘红色贵族’万岁”，这是一个“一针见血”的充满苦涩的总结。⁴

还有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说是要把隐藏在群众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美蒋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彻底扫除。其实矛头是指向第一、二代知识分子的，利用他们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历史中的所谓问题，捕风捉影，随意牵连，无限上纲。许多“问题”都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已查清，有了结论的；现在继续纠缠不休，就制造了更多的冤假错案。结果是清查运动中，自杀的人数是清华文革中最多的阶段。⁵

1969年，工宣队组织先后5批共计约2800余名教职工开赴江西南昌郊外鲤鱼洲农场劳动，实际是对知识分子一次新的惩罚和迫害。该地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水下劳动和防洪，教职工患上血吸虫病者当年确诊747人，怀疑待查者111人，次年患者已突破千人，后遗症更是十分严重。⁶

¹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17页。

² 蒯大富：《潮起潮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第374—377页。

³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44—655页。

⁴ 见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316页。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95页。

⁵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17页。

⁶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武斗”》，第283—284页。

1975年10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清华开展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右倾翻案风”运动，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事情是由清华内部矛盾引发的：工宣队在整党运动中陆续解放了以原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这也是文革中后期的大势所趋。但这些干部很快就在一系列办学和开展运动的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派来的工宣队领导迟群、谢静宜发生了分歧，迟、谢专横跋扈的作风，更引起反感。于是，由刘冰牵头，几位清华领导干部两次写信向毛泽东告状，并由邓小平转递。毛泽东观察了一段，断定“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显然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而邓小平就是他们的后台。于是决定反击，仍然选择清华作突破口。按照毛泽东“清华大学可以出辩论，出大字报”的指示，清华立即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实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¹而且“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把矛头指向教师，全校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的有60多人，点名批判的有400多人，自然不得人心。²而毛泽东本人，却是认真的：这是他最后一次直接干预和利用清华文革运动，是他维护自己的文革路线与成绩的最后努力，也是他和邓小平代表的党官僚的最后博弈。但他并没有能做到像往常那样，“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真正支持者上层只有中央文革派那几个人，地方也只是仍在坚持文革理想或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少数造反派，不可能形成群众性的政治支持力量。大多数被他整肃过的造反派已经彻底失望或有了自己的新思考，不再追随。更多的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早在内心抛弃了毛泽东的文革激进路线，而把同情转向了邓小平代表的“还能按常理办事”的老官僚。此时，在文革中曾经叱咤风云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成了孤家寡人：离文革结束之日，确实不远了。■

2016年7月12日—8月9日

¹ 参看逢先知、金仲及：《毛泽东传》（下），第1753—1754页。

²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第661页。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慕太冲

本期校审：梁幼志

本期版式：姜而文